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蓄谋由来已久。早在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的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就制定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方针:在侵占中国后,“北上”进攻苏联,“南进”夺取南洋,“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权为目标”。^① 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捆住了日军的铁蹄，方使它侵入太平洋的企图久久不能实现。

1940年上半年，德国向北欧、西欧发起闪电进攻，并频频得手。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20日，法国的贝当政府正式宣布向德国投降。此时，英伦三岛已处在德军直接威胁之下。

德国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攻，使英法无力东顾，大大减弱了日本向南洋扩张的阻力。日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急于武力南进。“‘不要错过公共汽车’的暗语流传开来，‘南进良机热’沸腾起来。日本要从欧洲战乱中，火中取栗”。^②

日本为了推进向南洋发展的新政策，在军政各界的策动下，1940年7月16日，米内内阁总辞职，7月22日组成第二次近卫内阁。7月27日，该内阁和大本营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帝国要在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迅速解决对华战争的同时，抓住时机，解决南洋问题。在没有结束对华战争以前，关于以对南方政策为重点的态势转变问题，应考虑内外全盘情况来决定。……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可以使用武力。”^③

这个文件，明确记载了日本要武力南进，侵占南太平洋地区。所谓把“对南方政策为重点的态势转变”，就是意味着日本政略和战略上的重点，将转移到南太平洋地区。

近卫内阁还要求整顿战备，加强对外态势，约在1940年9月底左右完成武力南进的各种准备。

① 日本历史学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22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233页。

③ 转引自[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450—4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正面战场

可是,由于中国战场“百团大战”等战役对日军的打击,使日本统帅部企图立即缩减在华日军,拼凑南进 11 个师团兵力的计划落空,加之德国军队推迟在英国本土登陆,日本南进的战略计划不得不延宕下来。因此,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压力,为他们争取了对抗日本法西斯进攻的整军备战时间。

日本要实施武力南进政策,势必使日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但双方没有放弃继续通过外交手段调整两国关系的企图。从 1941 年 3 月开始,美国为保护其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与日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外交谈判。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使日本在对外扩张政策上,又面临新的抉择:一是北进,配合盟友德国,进攻苏联,实现其早已既定的战略企图,即侵占中国后,首先北进攻打苏联;二是武力南进,夺取南太平洋的战略资源;三是维持现状,待机而动。

日本大本营和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认真研究后,于 7 月 2 日确定了“秘密作好对苏作战准备”,“如果德苏战争的进展情况对帝国极为有利,就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的新国策。然而,由于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不能与苏联远东地区兵力形成较有利的对比态势,日本大本营准备从中国战场抽调 5 个师团对苏作战的计划,也因中国军民的打击牵制,难以实施。日本对苏联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计划被迫搁置下来,苏联在远东受到的最严重威胁,也由于中国战场对日军主力的牵制而趋向缓和。

日本北进不成,又不得不转向南方寻找出路。1941 年 7 月 21 日,日本与法国达成法属印度支那的共同防御协定。29 日,日本第 25 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以主力驻屯西贡附近,对英美在东南亚的势力造成进一步威胁。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日军撤出印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度支那。7月25日,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财产,荷属东印度、英国及其属地也相继仿行。26日,英国废除了日英、日印、日缅通商条约。28日,荷属东印度废弃了日荷石油协定。美国于8月1日对日本禁运飞机用汽油及润滑油。26日,菲律宾军队编入美军。日美矛盾进一步尖锐,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

8月9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通过了无论德苏战争如何演变,打消在昭和16年(1941年)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专心致力于南方的方针。为此,制定了《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其要点是:“(1)以驻中国东北、朝鲜的16个师团对苏严加戒备;(2)按既定方针继续对中国作战;(3)对南方以11月为限,加强对英美的战争准备。”^①

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了《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决定对南方的对策按照下列各项原则执行:

“一、帝国为了确保生存和进行自卫,并以不辞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心,大体上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

二、帝国在进行准备的同时,对美、英采取一切外交手段,力求贯彻帝国的要求。

三、通过前次外交谈判,到10月上旬如果仍然没有希望实现我方要求时,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②

10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因对美政策及在和战问题上内部意见分歧而倒台。天皇命令力主南进的强硬派东条英机组阁。18日,东条内阁上台,从而大大加快了南进的步伐。

东条内阁在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准备的同时,派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到美国活动,迷惑美国,以争取备战时间。10月20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和谈“新”建议,继续要求美国承担原有对日本

^①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第162页。

^②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650页。

的义务,而日本在日中议和前,在行动上不受约束。美国拒绝了这一建议。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及“满洲国”,废除德意日三国同盟。日本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为继续施放和谈烟幕,并未立即通知美国。12月7日,当在华盛顿的野村、来栖将日本的决定通知赫尔时,已是日军突袭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1小时之后了。

实际上,早在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就决定对美、英、荷开战,并采取以下措施:(1)发动进攻的时期定为12月初,陆海军应作好作战准备;(2)对美谈判按附件要领进行之;(3)加强和德意两国的合作;(4)在发动武装进攻以前,和泰国建立密切的军事联系。^①当日,日本天皇即批准了陆军这一作战计划。翌日,日本大本营下令编成南方军。总司令官为寺内上将,以第14、第15、第16、第25军(计9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及第3、第5飞行集团(计17个战队)为基干。接着,从中国方面抽调6个师团(第21、第33、第5、第18、第38及第4师团并抽调第3飞行集团的主力等),编入南进序列。同时给各军下达了准备应付开战的命令和具体部署。

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又对南方军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即南方军总司令官与海军协同,迅速攻占南方各要地:(1)应占领的要地为菲律宾、英属马来、荷属东印度的各要地及缅甸南部的一部等;(2)实施作战时,务必保障泰国及印度支那的安定,同时从该方向实施对中国的封锁;(3)为了恢复占领地的治安,取得重要国防资源,且保障自给,应对占领地施行军政管理。^②

①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657页。

②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668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12月1日,在日本政府全体阁僚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天皇批准了开始进攻的命令,开战日期定为12月8日。至此,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1941年12月7日23时55分,日军佗美浩少将指挥的以步兵3个大队为基干的佗美支队,在第3水雷战队护卫下,于哥打巴鲁附近海上抛锚。翌日1时35分,第一批登陆舟艇群齐向海岸进发,受到岸上机枪、火炮的一齐射击。2时15分,日佗美支队在英属马来半岛登陆成功。日本不宣而战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12月8日1时(夏威夷时间7日5时30分),远征3500海里,到达夏威夷北方230海里处的日本海军,从巡洋舰“利根”号及“筑摩”号上,各射出零式水上侦察机1架,对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进行战前侦察。1时30分,由日本183架飞机编成的第一批攻击队,一直向南飞去,奇袭珍珠港。2时45分,由167架飞机编成的第二批攻击队也离舰飞向珍珠港。^①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遭日军350架飞机两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手足无措,结果被击沉战舰6艘、重巡洋舰1艘,击伤巡洋舰、驱逐舰等10余艘,击毁飞机约300架,美军死伤4000余人,损失惨重。

日军偷袭珍珠港,其目的是斩断“对准日本咽喉的一把匕首”,以解除美军太平洋舰队对南下进攻的威胁。日本在珍珠港几乎全歼了美太平洋舰队主力,为其南下作战扫除了侧翼威胁,解除了后顾之忧。

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初,日军一面大举南下,一面东进突袭夏威夷,在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两个广阔的战区长驱直入,纵横驰骋。

日军南下进攻的结果是:1941年12月25日占领香港;1942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中册,第1~3页。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正面战场

年1月2日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2月15日,驻新加坡新任英国远东军总司令珀西尔中将向日军无条件投降;3月8日,日军攻占缅甸仰光,并向纵深进军;3月9日,驻万隆荷军宣布投降,荷属东印度遂告沦陷。与此同时,日军还进击了西太平洋诸岛。1941年12月10日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同日,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岛和塔拉瓦岛;12月23日占领了威克岛;1942年1月23日,日军占领了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港;并先后占领了俾斯麦群岛、新爱尔兰群岛、新不列颠群岛、中所罗门群岛的大部及新几内亚岛的东北部地区。5月3日,日军攻占图拉吉岛,其进攻前沿阵地已远离日本本土5500公里。5月6日,在巴丹半岛曾从事英勇抵抗的美菲军总指挥温赖特将军投降,日军最终占领了美菲军在菲律宾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

至此,日本侵略者控制、占领了东南亚地区和西南太平洋海域,形成了北起千岛群岛,经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帝汶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安达曼群岛至缅甸的一道“外围防御圈”,其土地面积达38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的10倍,人口1.5亿。中途岛以西太平洋上数以千计的岛屿和大约3000万平方海里的广大海域,一时间竟成了日本的“内陆”和“领海”,日本已完全掌握了太平洋战场上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扩张达到了极限。

交战双方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共毙、伤、俘美、英、荷等盟军官兵30余万人;击沉、击伤大型作战舰只约40艘。日军伤2.5万人,亡1.5万人,沉驱逐舰4艘,伤巡洋舰2艘,损失飞机约380架。^①

^① 见王书君:《太平洋战争分期问题初探》,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第2辑,第175~176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二、中国对日宣战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太平洋战争是日美两国在亚洲历经 30 年争霸,终于酿成的一场巨大规模的战争。它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尤其是东方战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至此,日、德、意法西斯侵略集团已将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拖入了战争状态。珍珠港的炸弹,炸醒了美国人民,把美国从“孤立主义”的迷梦中解脱出来,宣告了西方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破产。

太平洋战争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在军事上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参战的可能性。日本的一部分兵力将被美国吸引过去,这或多或少地能减少日军对中国战场的压力,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因此,当蒋介石在 12 月 8 日凌晨 4 时,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立即从重庆南郊黄山的乡间别墅赶赴重庆。当天上午 8 时,就召开了紧急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兴奋异常的蒋介石讲到: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会议决定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等国军事同盟,并由美国领导。下午,蒋介石分别召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除通知他们中国已决定向日、德、意法西斯同盟正式宣战外,并将中国提议成立中、美、英、苏、澳、荷、加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了三国大使。蒋介石的建议,迅速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积极响应。

1941 年 12 月 9 日,国民政府发布对日宣战文告,称“过去四余年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同日,国民政府还公布了自当日午夜

起,中国与德国、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的文告,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①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加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努力。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宣言》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宣言》呼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辉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宣言》提出了建立太平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等八项重要任务。《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指示》又指出:“中国人民与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②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扩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欧亚美许多国家也纷纷对日宣战。

12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国会,请求对日宣战。罗斯

^① 《中国国民党历史事件人物资料辑录》,第1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第221~222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福在请求对日宣战的咨文中写到：“余兹请国会宣布于1941年12月7日遭受日本蓄谋非法袭击后，合众国与日本帝国间，已有战争状态存在。”^①

1942年元旦，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截至1945年5月1日止，除原签字国外，又有玻利维亚、巴西等21个国家加入了本宣言），规定凡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对抗法西斯同盟国及其附从国家，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相互援助，紧密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②2月23日，英、美两国签订了《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5月23日，苏、英两国签订了《对希特勒德国及欧洲五国作战的同盟和战后合作互助条约》；6月2日，中、美两国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6月11日，美苏两国签订了《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结成。中、苏、美、英等国更加团结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帮助和同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性质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和变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保障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使以德、意、日为首的穷凶极恶、妄图征服全世界的法西斯势力归于可耻的灭亡，而且造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造成了大批被殖民主义者奴役的国家的独立，使统治了亚洲、非洲大多数国家一二百年的殖民帝国土崩瓦解，中国和这些新独立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进入了世界政治舞台的重要地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第161～1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43～34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位。可谓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也赢得了历史的进步。

三、日本促使国民政府屈服阴谋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时,为了从泥足深陷的中日战争中解脱出来,全力对付太平洋战场上的英、美,就妄图把中国拉向日本一边,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对英、美作战,从而进一步加紧了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的活动。

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的 1941 年 11 月 15 日,日本在制定的《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战争草案》中,就提出了如下方针:利用形势发展,尤其是作战成果,抓住有利时机,采取积极措施,促使重庆政府屈服。

12 月 10 日,日本参谋本部鉴于太平洋战争进展极为顺利,当即着手研究“对重庆工作”。18 日,在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重庆问题作为紧急议题被提出。议题的内容是,加强“重庆屈服工作”,“特别是抓住进攻南方要域告一段落的时机使工作取得成功”。

为加紧使“重庆屈服工作”,1941 年 12 月 24 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作了如下决定:(1)首先设置对重庆谍报路线。由大本营陆军部负责,有关部门协助。该工作仅限侦知重庆方面动向,概不涉及屈服条件等。为此,应采取利用中国要人及其他外国人等措施。(2)通过帝国取得的战果及对其要害部门的强大压力,乘重庆方面动摇适时由谍报工作转为屈服工作。其时机、方法由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①

日本对于促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工作,开始估计比较乐观,它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 28~29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认为对英、美初战的胜利,将使蒋介石政权发生动摇,重庆国民政府就会屈服投降。殊不知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政府的对日宣战,对国民党内部的亲日势力无疑是一沉重打击,扼制了他们的投降活动。其次,美国对日宣战后,更需要依靠中国抗战,把大批日军继续拖在中国战场上,以利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决战。为此,它除在军事上、经济上援助中国外,还需要同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合作。这使重庆国民政府坚定了依靠英、美期待胜利的思想。即使日本一再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也不会轻易就范。这正如1942年3月9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作出的《对各国可能采取的策略、动向的判断》中所分析的:“重庆政权抗战力量虽渐低落,其财政经济状况亦甚紧迫,但以其党及军队之威力为背景,尚能坚持强韧的抗日意识,且因期待反轴心阵营的最后胜利,尚不至放弃抗战意志。而最近与苏联之合作愈益加强,并与印度民族谋求接近,此等动向,均可认为力图促成抗日阵营之统一。”^①

日本诱降不成,又多次谋划用军事力量攻占重庆,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但又抽不出足够的兵力。日本无可奈何,于1942年6月1日发出了《对重庆作战的困惑》:即使以武力攻占重庆,也不会解决问题。“在经济上,照现在情况进展,即使攻占重庆,二三年内也不致垮台。在政治上,中国基于最后胜利在反轴心国方面的信念,依靠英美及本国地广人多,即使重庆被攻占,蒋介石的抗战意志也不会改变,甚至即使和战两派对立,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能否屈服,也成问题”。^②至此,日本侵华政策已陷入左右为难的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1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375页。

困境。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外关系

一、美国援华的加强与中美在对德日作战问题上的歧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尽管通过了租借法案,但仍不敢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即向美国政府提出《经济援助方案说帖》,宣称“现中国之财政金融及一般经济,情势至为危急,尤其法币之发行,已达饱和点以上,将至恶性膨胀之程度……若无适当之力量迅与补救,则形势有更趋恶化之虞,足以造成严重之危机”,为此呈请美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①

美方原先坚持中国必须制定借款具体方案,限定用途,并受美国监督。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甚至建议将款项直接作为军饷按月拨款。但蒋介石拒绝这种方法,坚持借款“不能有任何之条件及事先讨论用途与方法”。^② 罗斯福总统出于支持中国战场的考虑,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于1942年1月30日召集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商讨。2月7日,美国会通过这笔贷款,并于2月13日由罗斯福正式签署成法案。

美国对中国的军需物品援助也有所加强,中国的胃口也愈来愈大,仅1942年4月18日,蒋介石向美国催要的急用军需品中,就有步枪20万支,手枪45000支;手提机枪22000挺,轻机枪15000挺;战车防御炮720门,山炮720门,榴弹炮454门;高射机

^① 《战时外交》(一),第323页。

^② 《战时外交》(一),第332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枪 1 360 挺,高射炮 1 360 门;子弹 3 亿发。^①

1942 年 5 月底,中美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又名“租借器材案草约”),规定“美国政府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②

据统计,从 1942 年 1 月至 1944 年 9 月,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火器械计有:飞机 326 架,战车防御炮 362 门,各类火炮 657 门,迫击炮 514 门,火箭筒 1 030 具,战车防御枪 1 269 挺,重机关枪 3 044 挺,手提机关枪 16 690 挺,步枪 21 000 支,手枪 442 支,各类子弹 26 950 万发,各类炮弹 90 万发,各种汽车 700 余辆。^③

在缅甸失陷以后,中国的受援物资仅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空中航线担任。承担运输任务的有美国空运队(American Ferry Command)和中国航空公司。由于航线初辟时飞机很少,美国又拒绝提供四引擎的大型运输机,故空运量很少。1942 年 12 月,美陆军运输队(Army Transport Command)接替了空运队工作,陆军运输队拥有 225 架运输机,使运量大增,到 1943 年 12 月时,每月空运量已达 12 590 吨。^④

然而,尽管如此,中美关系上依然存在较大矛盾,这主要是由于下列原因引起的。

第一,中国战区的地位问题。中国战区成立后,中国战场的地位却始终得不到重视。中国代表不仅被排斥于英美参谋团联席会

① 《战时外交》(一),第 495~496 页。

② 《战时外交》(一),第 502 页。

③ 根据《战时外交》(一)所载各时期军火供应情况统计。

④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 830~832 页。

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和军火分配委员会(The 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之外,且连适用于租借法案下的美国援华器材也改由美军代表史迪威控制。而在此之前,援华物资一经装船离美,所有权即归中国。蒋介石屡次通过间接的方式向罗斯福表示:“如果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与物资分配之机构不能扩大,使中国得以参加,则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① 声称“中国民众今已渐怀疑窦,岂联合国将以为无维持中国战区之必要耶……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②

第二,援华物资数量问题,自滇缅路中断以来,美援华物资数量急剧下降,1942年5月、6月、7月的空运量分别是80吨、106吨和73吨。而约4.5万吨的援华物资堆积在印度无法运抵中国。美国原定派50架四引擎“空中堡垒”式大型运输机(每架运载量为3吨)担任中印运输,后改派24架,最终这24架飞机也调往地中海。美方还通知中国,鉴于援华物资在印度严重积压,7月份拟停运在美待运的物资器材(约15万吨)。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加强在华空军力量,结果不仅一架飞机未得到,就连名义上隶属中国战区指挥的美国驻印第10航空队在奉命全部飞往北非作战后,竟未通知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极为恼怒,于6月29日通过史迪威向美国政府提出“保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之需要”三项:“(1)八九月间美国应派军队三师到达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国与缅甸之交通。(2)自八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五百架,如有损失,随时补充,不令有坠此标准以下之空隙。(3)自八月份起经常保持每月五千吨之空中运输量。”^③

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18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145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173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第三,史迪威来华的使命与身份问题。中国战区成立以后,蒋介石曾电请罗斯福总统指定一位高级将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而1942年3月,史迪威来华就职时却具有双重身份:其一为美国总统驻华军事代表,负责管理美对华租借物资,指挥驻中、印、缅之美军,出席中国战区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滇缅公路监督人,蒋介石和魏菲尔之间的联络人;其二为中国战区参谋长。^①这种双重身份使蒋介石颇为不快,认为“彼以予之参谋长之资格应服从予之命令,然彼以总统代表资格,所取态度又截然不同。此实使予茫然不知以何等人物待遇之,如为余之参谋长,自应以部属视之,然为总统代表则又应以上宾遇之”。^②尤其是7月2日,蒋介石又因租借物资的分配权问题同史迪威发生争执。为此,史迪威致函蒋介石,陈述自己的地位是“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故在任何上述军事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用”。^③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当即致电宋子文,称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挟制统帅”,令其同美国政府“重新协商参谋长之职权”,并声言今后“凡在中国战区内既任参谋长职务,则其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④自7月3日以后,蒋介石拒不接见史迪威,对其书信也不予回复。

为调解中美矛盾,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衔命再次来华,于7月21日抵达重庆,8月6日离渝。在重庆的16天中,先后同蒋介石会谈了13次,其内容包括史迪威的地位与责任问题;印度独立问题;改善中英关系问题;三路反攻缅甸问题;中

① 《战时外交》(三),第561-562页。

② 《战时外交》(一),第645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608-610页。

④ 《战时外交》(三),第608-610页。

苏关系问题；中美外交隔阂的原因问题；中印空运物资的数量问题；战后土地分配问题；国共关系问题，等等。讨论的重心是史迪威的地位与身份，以及中国战区的地位问题。

蒋介石对于中国不能参加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忿忿不平，认为“中国迄今仍未经视为一重要战区，战时所得之待遇如此，和平恢复之后，复有何希望可言？届时……一切和平条件，将由英美独断为之”。^① 居里却称中国的地位是接受援助而非输出援助，又无海运能力，故无参加讨论分配剩余生产之必要。蒋介石对于原定的援华飞机改拨地中海一事耿耿于怀，并重申每月5000吨援华物资和500架飞机是中国参与反攻缅甸的必要条件。关于史迪威的双重身份问题，双方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蒋介石还请居里将几份备忘录转交罗斯福总统，劝其修正“先德后日”的战略，并维持中国战区500架飞机和每月5000吨援华物资。他在备忘录中声称“不先解决日本，而欲先解决德国乃为不可能之事”，“以美国力量，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当不能有大助于英国与苏联，而美国本身反不能免除日本之牵制”，因此，他劝罗斯福对于“先德后日”之战略，“必须加以修正”。^② 另外，他请罗斯福维持中国战场的最低限度之需要，否则，“中国军民若一旦灰心失望，则侵略者之横行与世界战局所蒙之不利，自不难想象而知”，^③ 这不啻是一种变相的威胁。

居里访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美关系。9月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保证今后必将“尽速尽量以接济”中国，但亦表示“美国暂时除在中、印建立美空军与建立空运路线，使足以维持美国空

① 《战时外交》(一)，第635—636页。

② 《战时外交》(一)，第674页。

③ 《战时外交》(一)，第676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军在华作战与继续供给中国兵工材料外,实不敢多所作为”,^①对于派遣美军赴印缅作战之请求实亦加以婉拒。对于史迪威的地位,仍坚持其双重身份不变,这就为后来蒋史关系的恶化埋下了种子。

所以,居里访华的结果,“除对空运稍有进步外,关于恢复缅甸及五百架战斗机计划,并未能使之切实接受,总统亦不愿鞭促,原因皆在注重对德”,^②这是对美中关系摩擦原因的一个较客观的分析。

二、中英在印缅问题上的龃龉

自1940年10月英国重新开放滇缅路以来,中英关系有了极大改善。同年12月,中英又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开辟了中英军事合作的新途径。蒋介石还草拟了《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建议成立中、美、英三国同盟共同打击日本。但丘吉尔认为“吾人若向日本挑衅,实为不智”,拒绝了中国的建议。^③然而,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丘吉尔即于翌日致电蒋介石,称“英国与美国业被日本攻击,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④表明了中、英、美合作的积极姿态。蒋介石当即回电表示“从此中英两国人民并肩作战,誓必扫除共同之仇敌”。^⑤

共同的利益将中、英两国紧密地联合起来,但是,不同的出发点又使得中、英双方各行其是,合作伊始就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① 《战时外交》(一),第722页。

② 《战时外交》(一),第723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45页。

④ 《战时外交》(二),第89页。

⑤ 《战时外交》(二),第89页。

蒋介石自认为“英美以后则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①因而拟定了中、美、苏、英、荷五国太平洋联合作战大纲，幻想立即依靠国际力量来打败日本。他更希望英国坚守东南亚，尤其是缅甸，以保持中国海上通道的畅通无阻。然而，英国对于与中国共同作战根本不感兴趣，英国只是希图借助中国陆军力量来延缓日本凶猛的攻势，它没有死守缅甸的信心和计划。因此，在重庆召开的中、英、美联合军事会议上，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Archibald Wavell）对联合作战毫无兴趣，硬要会议讨论如何保卫缅甸问题，并提出3项要求：（1）调昆明美国空军志愿队前往仰光协防；（2）从美国援华物资中拨出一批飞机、大炮、卡车和通讯器材供英军使用；（3）中国军队派两个师入缅作战。^②在此之前，英国军方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便擅自将美国援华物资中的150辆卡车和大量军需品调拨英军使用，这次又毫不考虑中国方面的急需，而要将陈纳德空军志愿队和美援军火转往缅甸，此种利己态度，无疑使中英矛盾公开爆发。何应钦在会上当即表示“愿将所有在缅甸的一切租借物资军火全部退还美国，撤回在缅甸的机关与人员，停止中、英、缅间的一切合作”。^③后经美国代表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出面调解，英国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美国也训斥了在缅甸掌管援华物资的官员，事情才得以平息。

其次，中英在印度问题上也有龃龉。英国当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印度国大党在甘地领导下，正进行不合作运动，拒绝支持英国对德、意、日的战争，而日本利用“亚洲是亚洲人的”口号，煽动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动摇英国在印度的

①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3页。

② 《战时外交》（一），第83—85页。

③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787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统治。印度对于欧亚两个反法西斯战场均有重要作用,尤其对中国更为重要。为了调停英印冲突,蒋介石于1942年2月访问了印度,并同印度国大党领袖和英印总督多次晤谈,但由于英国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和国大党人坚决的独立要求,使蒋介石印度之行未达成预期的目的。蒋介石因而对英国政府流露了不满,回国后继续向英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在英印矛盾全面爆发,英印当局于8月将甘地、尼赫鲁等人逮捕入狱后,蒋介石反应强烈,多次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尔(Sir Horace Seymour),迫其释放甘地等人,并呼吁罗斯福出面干预。8月31日,丘吉尔致函蒋介石,以严厉的措词批评了蒋介石,认为他袒护国大党人,干涉了英国内政,并暗示蒋介石如不停止这种干涉行为,将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①

再次,中英在缅甸的联合作战使双方产生了较深的隔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远东军队在日本攻击下显得狼狈不堪:远东海军舰队全军覆没;香港、新加坡危在旦夕,缅甸和印度也面临险境。为此,英国驻华军事代表丹尼斯将军于12月10日请求蒋介石履行中英协议,派军队协助保卫缅甸。蒋介石对英国颇存戒心,表示中国军队愿意入缅作战,但“唯一要求,为防守某地区或某线时,必单独负责,绝不愿与英军混合作战”,^②显然不愿受英国指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为此紧急拜会蒋介石,称“局势紧迫,急待援军”,“捧双手以恳求贵国之协助”。^③而当蒋介石同意派8至10万军队入缅作战后,英国又拒绝这么庞大的中国军队入境,英军总

① 《战时外交》(三),第486~487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62~63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62~63页。

司令魏菲尔表示,“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①只要求中国先派3个团进入缅甸。事实上,英国是怀疑中国人入缅的动机,害怕中国军队在这块以前中华帝国的藩邦之地卷土重来。由于英国的阻挠,中国远征军直到2月初才被允许开入缅甸一二个师,以后逐次增兵,直到3月初还未抵达预定阵地。而且英国此时允许中国军队入缅的目的,已不是同中国协守缅甸,而是要让中国人去抵挡日军锐不可挡的进攻,掩护英军的撤退。加之英军在战役期间利己的表现,加深了中英间的不信任。缅甸战役的结果,中国不仅损失了五六万最精锐的部队,还被切断了滇缅路。更有甚者,丘吉尔在5月10日的演讲中,对中国军队援缅的功绩只字不提,这使蒋介石十分愤怒,他批评丘吉尔及其英国“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②

影响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双方在反攻缅甸问题上的尖锐分歧。

缅甸的失守,使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断绝。美国和史迪威将军力图联合中、英力量打通滇缅路,收复缅甸,但中、英对收复缅甸的态度却有本质上的不同。英国对于收复缅甸毫无兴趣,并不愿意派一卒一兵;中国尽管由于交通线被切断,物资军火更趋匮乏,但蒋介石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不愿单独承担收复缅甸的重任,坚持美、英海陆空三军必须联合一致,同中国共同收复缅甸。所以,当史迪威于1942年底拟定了英、中、美三国军队由印度阿萨姆、中国云南和孟加拉湾三面攻击缅甸日军的军事计划后,中、英在反攻问题上的歧见更趋明显。英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心在欧洲,英国海、空军没有力量南移而加入收复缅甸的战役,因

① 《战时外交》(三),第93页。

② 《党史概要》(四),第1226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此拒绝海军开赴孟加拉湾攻击仰光,只同意陆军方面的配合作战;中国坚持反攻缅甸必须由水、陆两路同时进行,蒋介石指出,“这次缅甸作战的中心问题是在英国有没有能力掌握孟加拉湾的制海制空权,以阻止仰光的日军增援,如海、空军实力不够,我不愿令派一兵一卒参加这次战役”。^① 收复缅甸的计划于是被搁置。

在1943年1月14日举行的卡萨布兰卡英美首脑会议上,美国以退出欧战相要挟,迫使英国同意派海军参战。中、美、英三国高级官员在印度加尔各答开会,决定反攻缅甸的战役在同年10月底进行。但同年5月,丘吉尔又在华盛顿三叉戟会议上改变态度,表示英国海、空军无力东顾。如此几经反复,中英两国在反攻缅甸问题上争执不下,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

尽管中英关系充满矛盾,但中英关系毕竟得到加强与发展。1942年初,英国同意向中国贷款5000万英镑(约合2亿美元);滇缅路被切断后,以印度为基地的驼峰运输线的开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军用物资匮乏的燃眉之急;中国驻印军官兵32000余人在印度蓝姆伽(Ramgarh)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为后来收复缅甸北部,打通滇缅路交通奠定了基础。

三、陷入低潮的中苏关系

自1941年初以来,中苏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采取反共政策,导致了苏联的不满;另一方面则由于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宣布“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② 侵犯了中国主

^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54~855页。

^② 《战时外交》(一),第391页。

权。加之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已不可能有较大的物质力量来援助中国抗战。

1941年底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使蒋介石幻想将苏联拖入对日作战。他屡电斯大林,陈述苏联参战的理由,声称“大陆对日作战必须中苏两国同时宣战,方能击破共同敌军之日本”,^①“此时惟有苏联能及早先发制人,则太平洋局势尚可挽救,而苏联在远东之现状乃可获得安全”。^②但斯大林出于本国战略的考虑,屡拒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指出“在整个反轴心集团的阵线之系统中,抗德阵线,具有决定之意义”,“本人以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故恳请蒋介石“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的主张”。^③同时,苏联还拒绝参加由中、美发起的太平洋5国军事会议。

尽管蒋介石对苏联存在极大的猜忌与深刻的敌意,但出于抗日的需要,他还不肯公开同苏联交恶。1942年5月中旬,中英军队在缅甸遭到惨败之后,中国惟一的海上通道被切断,重庆政府一直在为美英援华军械物资假道苏联运抵中国而努力。美、英政府也力促苏联同意此举措。在美、英的压力之下,苏联曾表示愿意与美国政府商洽开辟阿拉斯加(Alaska)经由西伯利亚到达中国的空中航线问题,但旋即因顾虑日本会因此进攻西伯利亚而予以拒绝。中美两国政府也要求苏联政府允许援华物资由波斯湾的沙赫普尔港(Bandarshapur)经波斯铁路转道苏联中亚铁路;或由卡拉奇(Karachi)经波斯扎黑丹(Zahedan)、苏联阿什哈巴德(Ashkhabad)再转运至中国新疆哈密的计划。但苏联政府以波斯及中亚铁路军

① 《战时外交》(三),第42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68~69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391~392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运拥挤为由加以拒绝。^①

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从3月22日起,至5月22日止,两个月中先后同苏联外交、外贸等部交涉6次,“所得答复,均同情我国之需要,而技术上须研究方能决定”。^②6月22日,邵力子再催促此事,仍不得明确的答复。1943年3月,中国新任驻苏大使傅秉常再向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催问假道之事,米高扬称“此事关键不在苏联,实因印伊路运量过弱”,而英国允诺援助之汽车又未到。他并表示“苏联援助中国之心始终不懈,目前不能积极援助,实因力有不足”。^③但后来英美增运1000辆卡车来华时苏联仍拒绝援华物资假道。

实际上,苏联此时不愿积极援华,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为害怕引起日本的过火反应,进攻西伯利亚。苏联此时极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欧亚两面作战,为了稳住日本,苏联当然不愿冒激怒日本的风险。

其二,为中苏因新疆问题产生了激烈的矛盾。1942年7月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A. S. Panyushkin)在重庆向蒋介石转交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 M. Molotov)7月3日致新疆督办盛世才信函抄本。此信列数了盛世才1934年、1936年、1941年3次反蒋的历史,并称苏联每次都坚拒了盛世才的要求,“谆谆劝告”他“对中央政府应矢诚拥戴,并与中央政府统一战线以与帝国主义奋斗”。^④苏联的意图,是向中国政府申明对新疆没有领土野心。

但蒋介石在召集何应钦、程潜、徐永昌、张治中、贺耀组、周至

① 《战时外交》(二),第395页。

② 《战时外交》(二),第396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402~403页。

④ 《战时外交》(二),第436~437页。

柔等商讨后,认定“苏联有吞并”新疆之阴谋,现将此信函抄送重庆政府之目的,在于“挑拨离间盛世才与中央之关系,迫其铤而走险”,“以便扶植另一傀儡,以维护在新疆既得权益”。^① 于是,他们决定“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俟机再确实控制之”。^② 同时,他们还计划“乘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我之国际地位更有利时机,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取消承认伪满、伪蒙,不得支持中共,撤退驻新之红军第8团及空军、战车部队)”,“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③

7月16日,蒋介石召见潘友新时称:“今后两国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逕行交涉,以免发生误会。”^④

另一方面,蒋介石先后派朱绍良、翁文灏赴迪化安抚盛世才。同年8月,蒋介石又亲赴甘肃、青海、宁夏视察,并派宋美龄携其亲笔信飞迪化抚慰盛世才。蒋介石在信中表示全力支持盛世才反苏反共,要其肃清新疆共产党,逼使苏军撤离新疆,收回迪化飞机制造厂。重庆政府并支援其轻重机枪100挺。9月5日,盛世才果然命令苏联撤走所有驻新疆专家、顾问以及星星峡苏军,17日又在新疆全面清共,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驻新疆领导人。蒋介石利用盛世才反苏反共的阴谋得逞。

从1943年4月中旬起,苏联决定撤退驻新所有专家、顾问及

① 《战时外交》(二),第438~439页。

② 《战时外交》(二),第439~440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439~440页。

④ 《战时外交》(二),第441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军队,将迪化飞机厂撤回苏联。尽管中苏矛盾没有演变成激烈的正面冲突,但新疆问题无疑给中苏关系蒙上了阴影。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苏联政府在1943年10月于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上,坚决反对将中国列名“四强”,几使会议流产。斯大林也多次对英、美政府批评蒋介石抗日不力。

中苏关系的紧张理所当然引起美国的担忧,当美国官员询问此事时,重庆政府官员称“中苏间的主要问题是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如苏联誓言不利用中共来干涉中国内政,中苏两国就可获得基本谅解”。^①中苏这种外交关系上的低潮,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尽管日军侵占了沿海地区,但外国租界、租借地还存在,英、美、法等国在法理上还保持着领事裁判权等各种特权,它们也企图在日本侵华的同时继续保持各自的在华利益。

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也多次要求英、美修改不平等条约。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尤其是欧战的爆发,英、美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顽固立场,宣布愿意同中国商讨这一问题。从1939年至1941年,英国与美国均先后三次宣称,要在远东战事结束后的适当时期,同中国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等问题。1941年5月,中国先后同美、英通过换文的方式取得了美、英同意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的承诺,但仍须等到远东和平恢复以后方可实行。^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地租界与香港、九龙均为日军占领,英

^① 《美国国务院文件》,Foreign Relations: China 1942,第251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708~710页。

美的实际利益已经丧失。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中国已变成英美的盟国。因此,蒋介石及其重庆国民政府认为战后废约已同其现有之国际地位不相符,希望战时废约。同时,汪伪政府也在向日本提出接管上海租界的要求,这一事实更刺激了蒋介石立即废约的愿望。

美国也开始意识到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将对于中国抗战有促进作用。从1942年4月至10月,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的外交接触频繁,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英国政府尽管不太情愿立即放弃对华特权,但由于美国政府的态度较坚决,不得不依美国的意见行事。

于此同时,蒋介石也采取了较积极的外交活动来促成废约的早日实现。1942年10月初,他电令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立即向美国政府交涉,希望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0月5日,他又授意陈布雷以新闻稿的方式表明中国政府敦促美国率先自动废约的态度。该新闻稿声称:“纯以民众立场说明中国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者已一百年,偏颇的限制既阻碍了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屈辱的情感尤使四万五千万人伤心饮恨。去年英、美两国与我郭大使交换放弃特权的文书,对中国自不失为一种安慰。但那个诺言是以战争结束后为实行的时限,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感觉到遥远而不可即”。“我们实在希望盟邦尤其是美国对这个问题考虑一下,中国对于这一次大战,既然是担负着同等义务,负荷同样的责任,为鼓励上气与国民精神,似乎应使其没有一些卑抑之感才好。”希望“美国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作一件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单独自动的将对华条约中所包含的不平等条款,就在这时候率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声明放弃,不必待之战后再出以双方谈判的形式”。^①

10月10日,美、英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宣称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缔结一规定美英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② 同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宣布了这一消息。11日,他分别致电罗斯福和丘吉尔表示感谢。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他指示外交部“关于废除治外法权事,应静待美国政府提出其所谓简短之草约后,我方再行表示意见,此时不必作任何交涉”,但我方可以间接表示“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销,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的愿望。^③

中美关于签订新约的谈判从1942年10月24日正式开始,进展较顺利,尽管美国还无意完全放弃诸如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和军舰游弋权等等,但由于中国的一再坚持,美国最终放弃了上述特权。1943年1月1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新约。

中英间关于新约的谈判则障碍重重。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尔在重庆同宋子文的谈判中,不仅在通商问题上横生枝节,并且坚持九龙租借地不能提前归还。中国代表坚持九龙必须收回。英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的问题,中国则坚持先收回九龙,作为将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础。英方的顽固态度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

就在中英争执不下之时,日本也在同汪伪政府进行所谓废约谈判,蒋介石为赶在汪伪之前签订新约,被迫向英方让步,将九龙问题作为悬案搁置起来,并于1943年1月11日同英国签订了新

① 《战时外交》(三),第710~711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713页。

③ 《战时外交》(三),714页。

约。然而,汪伪政府还是抢先了两天,于1月9日同日本政府签订了所谓“废除治外法权”的协定,使重庆政府在面子上很不好看。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对新约一再延搁,以致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消息,殊为遗憾。”^①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对激励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有极大的作用。同时,在中国外交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但是,由于中国落后的科技与经济,低下的国际地位,还不可能真正完全取消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影响和后遗症,中英关于九龙问题的悬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五、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在名义上成为四强之一,但由于英美重欧轻亚的战略,中国战区始终得不到重视。尤其是英国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屑一顾,中国不仅被排斥于同盟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CCS)和军火分配委员会(MAB)之外,而且英美首脑间的历次会谈(如卡萨布兰卡会谈、华盛顿三叉戟会谈、魁北克会谈等)均不邀请中国参加。蒋介石对此种处境十分不满,曾向美国驻华军事代表麦克卢尔指出:“中国民众今已渐怀疑窦,岂联合国将以为无维持中国战区之必要耶?……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甚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②

美国出于在未来的世界中抗衡苏、日的目的,竭力主张让中国在战后世界和平中扮演大国的角色。为此,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11月向中、苏、英三国首脑建议召开开罗会议,以讨论对日本的联合作战计划以及战后远东新秩序的安排。由于斯大林拒绝出席,

^①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43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145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开罗会议就变成了中、美、英三国首脑的会谈。

由于中、英两国在上述问题中歧见很深,故罗斯福打算在充分倾听中、英两国的政策与见解之后,以调停人的身份来使中、英政策趋于一致。为此,罗斯福特派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来华向蒋介石说明开罗会议的目的,并询问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表达了以下几个愿望:(1)反对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原则(显然暗指英国和苏联);(2)罗斯福必须找到能为四强所一致接受的原则;(3)中国无法接受从属的地位;(4)盟军应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才能击败日本。^①

为出席开罗会议,中国政府当时准备了3个方案,综合起来有如下原则:

(一)关于军事:(1)美国应分三批装备中国陆军共90个师;(2)同盟国应于1944年雨季之前以陆、海、空三军力量收复缅甸,打通中缅路;(3)美国应派13个师在华南登陆,并在蒋介石指挥下向华中、华北进攻;(4)美国援华物资每月至少空运10000吨。

(二)日本投降应接受之条件:(1)战后日本存留之大部分舰船、飞机、军械以及作战物资应移交中国;(2)日本应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并承认朝鲜独立;日本战犯应受审判;(3)日本应归还从别国掠夺的一切财富,并赔偿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一切公私损失。

(三)关于战后重要问题:(1)以中、美、英、苏为主席团的联合国应继续存在,维持世界和平,并保证印度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2)战后中美应加强经济合作,美国应提供资金、物资与技术来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发展经济。^②

^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917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498~506页。

11月18日,蒋介石由重庆启程,途经印度,于21日上午抵达开罗。23日会议正式开始。在4天内,蒋介石分别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了多次正式会谈。

同罗斯福的会谈,是蒋介石开罗之行的重要目的,蒋介石同罗斯福先后会商了4次,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际地位问题;日本未来之国体问题;军事占领日本问题;日本对华赔款问题;中国收回失土问题;战后中美军事合作问题;美国对华经济援助问题;中美联合参谋会议问题;朝鲜、越南、泰国问题;国共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中英关系问题,等等。

蒋介石、罗斯福会谈在上述问题上大多趋于一致,但在某些问题上分歧亦较大,甚至尖锐对立。如罗斯福坚决主张中国应成为军事占领日本的主要力量,但蒋介石不愿意派兵;蒋介石要求美国再提供10亿美元贷款,罗斯福未置可否;蒋介石要求允许中国参加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罗斯福加以婉拒;罗斯福对国民党派大量军队监视共产党军队表示难以理解,批评蒋的政府不是现代民主政府,并建议国共组织统一政府,蒋介石却抱怨美国驻华官员的报告与事实有出入。^①

中英首脑会谈成为会议的难点之一。蒋介石同丘吉尔正式会谈了3次,反攻缅甸是中心话题,蒋介石坚持认为“攻缅胜利之关键完全在于海军与陆军之配合作战,同时发动”,^②而丘吉尔则以“海军集中,事关机密,不便在此宣布”^③为借口,拒绝告知英国海军的具体发动时间。后来由罗斯福出面向蒋介石担保,英国海军

① 参见《战时外交》(三),第527~530页;《党史概要》,第5册,第1808~1810页;《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922~923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537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543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同意进行登陆缅甸的作战。其他诸如西藏、香港和借款等问题的会谈也一事无成。诚如罗斯福对蒋介石所说，“现在所最成问题令人痛苦者，就是丘吉尔首相的态度”。^① 蒋介石亦深有感触地说：“开罗会议之经验，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之存亡生死，自更无论矣。”^②

但无论如何，开罗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就是中、美、英三方在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面已达成一致。12月3日，《开罗宣言》发表。宣言宣称：“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③ 这样，中国收回东北、台湾和澎湖群岛的权利得到了国际保证。

第三节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一、配合香港作战，日军再攻长沙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天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

① 《党史概要》第5册，第1809页。

② 《党史概要》，第5册，第1818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547页。

战争都进入了新的阶段。

作为实现南侵计划的一个步骤,驻广东的日军第23军在12月8日向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发起攻击。次日,军事委员会命令各战区牵制日军,以利英军的作战。中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开始向广州进攻,第9战区所辖的欧震第4军及邹洪暂编第2军奉命南下支援。日军第11军认为有必要对第9战区再兴一次攻势,“牵制其南下的行动”,以保证第23军香港作战的顺利。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11军上下普遍轻视中国军队的战力,所以才敢于在距上次大规模会战仅两月,部队的补充休整尚未完成,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便决定作战。12月13日,阿南惟几下达作战命令,内称:“我军以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作战,立即准备对江南地区发动攻势。”决定调集第6师团全部及第3师团、第40师团主力共约7万人,由于作战属配合性质,所能集中兵力又有限,第11军只计划用两周时间在汨罗江沿岸击溃中国第20军、第37军后,“即结束作战”。^①同前两次湘北作战事先仔细侦察、周密规划相比,这次显得匆忙而粗疏,犯了兵家大忌。各部日军得令后迅速向岳阳以南集结,分别到达新墙河以北一线地区。阿南惟几也在22日飞抵岳阳指挥所,准备第三次席卷湘北。

中国第9战区虽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受到挫败,部队伤亡较大,但中方及时召开了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会战得失,蒋介石与会,对第9战区的高级将领痛加责骂,并再三强调防守长沙等处的重要性,布置长沙防御工事的构筑。12月17日,第9战区又专门召开了由战区所属官兵代表参加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薛岳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在湘北实行后退决战的战略方针,并详加发挥著成《天炉战》一书,下发给各军官

^① 《长沙作战》,第140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学习,以作未来作战指导。会上薛岳还仿照蒋介石不久前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的口吻责令官兵:“尔后各部队作战,不论大小战役、不论任何部队,不能存有打三天、五天、七天、八天就算了了事之恶劣观念,必须立下必死之决心、必胜之信念,不胜则死,不胜则亡;前进则生,后退则死,绝无有败生退存之理。”^① 加上中国宣传机器大肆颂扬“第二次长沙大捷”,一般士兵的士气未因战败而受大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更使全国军民受到巨大鼓舞,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部队战斗力恢复较快。第11军在其友军香港作战的同时大量集结兵力,中方判断敌方有进攻湘北,策应香港的企图,便着手应战准备。薛岳在9月22日召集战区军事首长会议,进行部署。同日,军事委员会又临时把彭位仁第73军、夏楚中第79军、欧震第4军、王耀武第74军4个军划归第9战区指挥,令各军迅速赴湘北,使战区的战斗部队大为增加。具体战术上,仍是利用几条河流的屏障节节抵抗,在敌人的正面、侧面及背后进行袭扰,最后在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的日军全歼。^②

三次在湘北的作战,日方均以消灭保卫长沙的中方主力部队为目标,而中方则均判断敌方目标在于攻占长沙,并以长沙的得失作为衡判胜败的标准,每次都以保卫长沙或收复长沙为目标布置兵力,即使是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损兵折将,但因日军退出了长沙,第9战区在战后的总结却说:“本会战敌在战术、战斗上虽获相当成功,而战略上则全失败。反之,我军在战术、战斗上固有失败之处,而在战略上实获绝大之成功。”^③ 这是双方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差距,也因此使日军在湘北的几次军事行动都演成了大规模的会

① 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72页。

② 《抗日御侮》第8卷,第95页。

③ 《抗日御侮》第8卷,第95页。

战。

9月23日,日军第40师团主力开始向中国第20军(军长杨汉域)下辖第134师设在新墙河北岸的前沿阵地进攻。第三次长沙会战由此揭开了大幕。

湘北12月的天气,通常是晴朗干燥的,气温也不致很低,可日军进攻时,却突降雨雪,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道路泥泞,河流变得又深又急,这对于长途奔袭、机械化程度高的日军是极端不利的。乌云锁天,连日不开,日军飞机无法配合地面作战,空中优势不能发挥。不利的天气变化,是日军在前两次湘北作战中所未曾遇到的,给其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4日傍晚,日军第6师团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中国第133师的阵地,从新墙附近渡过了新墙河。稍后,第40师团也击穿中国第134师在河北的前进阵地,渡过新墙河。中国主力奋力抵抗后,在夜幕掩护下向东南侧山区的王伯祥、十步桥、观德冲一线撤退。同时,仍有少量部队坚守日军正面据点,以求消耗敌人。奉命固守傅家桥阵地的王超奎营在敌军层层包围、猛烈攻击之下,利用颓垣弹穴做殊死的阻抵,战至全营官兵壮烈殉国。^①

25日,渡过河的日军在破坏殆尽的泥泞道路上向中方的二线阵地追击前进。中国士兵冒着风雨严寒与优势之敌浴血激战,“有冻饿死于阵地者,有全营共阵地俱亡者,伤亡虽重,士气未衰”。^②双方激战一天后,日军仍未能完全攻破中方防线。第6师团、第40师团主力便利用守军防线的间隙,绕出守军的背后,扑向汨罗江北,与先沿粤汉路南下的第3师团会合,准备渡过汨罗江,击溃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94页。

^② 《杨森致徐永昌密电》(1941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江南的第9战区主力。

中国守卫汨罗江一线阵地的是不久前刚受严重打击而稍事整补的第37军(军长陈沛)和第99军(军长傅仲芳)。两军以新市为界划定防区:第99军配置于新市以西至湘江的江南地区;第37军配置于新市以东至张家坡的江南地区,接受前次会战中平行设置防线,敌人击破一点,全线即溃的教训,为能实现逐次抵抗的目标,两军注意了工事的坚固,并在主阵地后面构筑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纵深阵地。

日军第3师团沿粤汉线一路南下,26日到达汨罗江北岸后,便着手清扫江北,准备渡河。日军在炮兵、空军的支援下,向第99军在河夹塘、归义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两军展开了一场血战。此时日军获知中方在江南岸的部队有撤退的迹象,可能使其围歼企图落空,便强令先头部队不待后援,立即“提前渡河”。^①27日中午,第3师团主力冒着守军从南岸的不断扫射所构成的枪林弹雨,强渡汨罗江,第99军虽很顽强,但不敌日军的密集火力,主力后撤至牌楼峰、栗桥一线。第3师团为完成预定在汨罗江围歼中国第37军的任务,实现对第37军的包围,在29日全力突破第99军二线阵地的一段后,即改变原先由北向南的攻击方向,转向东方的新开市,准备“迂回攻击第37军”。^②

28日,负责主攻中国第37军的第6师团、第40师团也分别在新市、磨刀滩等处渡过了汨罗江,日军在渡江前后,遭到了第37军顽强阻击,加上连日雨雪,河水上涨,增加了渡河的难度,致日军伤亡较大。同第99军一样,第37军抵抗两天后,也不敌日军强大攻势,为免遭更大损失,于30日向东侧山地转移。

① 《长沙作战》,第153页。

② 《长沙作战》,第153页。

至30日,日军进展比较顺利,已攻至汨罗江南岸,对中国部队实施了打击,吸引第9战区部队无法向南影响香港作战,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按第11军原定计划,此时日军应全力合围第37军,将其击溃后相机结束作战。同时,日军第23军已在25日占领了香港,第11军在湘北作战的配合作用完全丧失,更应尽早收兵,结束这次匆忙进行的作战。可是,阿南惟几却无视战前准备的不充分(如第一线兵团仅携带7日所需的粮弹等),突然改变了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南进攻,争取攻占长沙。这就意味着彻底改变了作战目标,延长了作战时间。这一决定,成为导致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惨败的直接原因。

同一天,一心想报上次失败之仇的薛岳认为日军已迫近预设之决战区域,决战在即,便向所部官兵下达如下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甚巨;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捉战机歼灭敌军,获得伟大成果计,特规定下列三事:(子)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丑)薛岳若战死,即以罗(卓英)副长官代行职务,按照预定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寅)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宽恕。”^①薛岳的决心为蒋介石所肯定。

二、长沙保卫战

阿南惟几在策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初就有乘势攻略长沙的意图,开战之后在汨罗江以北地区的顺利进展,更让他产生了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长沙的错觉。他对长沙在中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相

^① 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79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当清楚,认为香港作战结束,第11军虽已无牵制中国军队的必要,但攻占长沙仍具有多重战略意义:“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把(中国)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到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有可能受到袭扰之感”;“表明皇军尚有余力”;“予第6战区以威胁”等等。^①他低估了中国部队的战力恢复程度,对于中方已在长沙周围屯集重兵的情况茫然无知,凭前次的经验断定汨罗江南至长沙间中方已无二线兵团进行有效抵抗,长沙的守军十分薄弱,因此,便不顾日方是仓促作战,后方供应困难,气候不利,敌情不明等兵家大忌,于29日贸然下达了“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作战命令,要求第3师团及第6师团一部进攻长沙,第6师团主力、第4师团则扫荡长沙附近地区,保证攻城部队的安全。^②

日军作战计划的骤然变更,使在艰苦条件下连续作战的第一线官兵疑惑不解,“没有理解作战目的”,“士气难免受到影响。负责后勤供应的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和负责侦察中国军队调动情报的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均对攻长沙有异议,二见秋三郎更直言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③

第3师团渡过汨罗江后已经于29日向东移动,参加围歼中国第37军的战斗,可当晚却接到了“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的新命令,便重新部署,至31日,第3师团主力已南攻至长沙附近的槩梨市和东山,准备攻击长沙。

鉴于上次会战中长沙失守而受蒋介石责备,薛岳对长沙的守卫不敢掉以轻心。他命第10军军长李玉堂死守长沙,并按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指示的修筑工事要诀,让第10军下辖的3

① 《长沙作战》,第158页。

② 《长沙作战》,第161页。

③ 《长沙作战》,第162页。

个师分别守外围阵地和核心工事。他对第10军的作战要求是，“第一步确保长沙；第二步，待敌进至浏阳河北岸，向长沙攻击三天后，待命向东反击敌军”。^①薛岳还命令长沙警备司令部、宪兵第18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单位协助第10军固守长沙。长沙军民加紧在城墙内外、交通要道、重要建筑物等处筑工事、修碉堡，严阵以待。第73军在岳麓山和湘江西岸布置阵地，与第10军形成内外呼应之势，尤其是建在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可直接轰击市内目标，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日军进攻长沙的企图完全暴露后，蒋介石于12月30日向第9战区指示长沙保卫战的作战方针：“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②第9战区下令各主力部队以长沙为目标，分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指定了各部队须准时到达的第一次攻击线（距长沙较远的四周地区）和第二次攻击线（长沙附近地区），以期在日军围攻长沙时，不断缩小包围圈，集中优势兵力，从外线对其实行反围攻。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从槩梨市和东山附近渡过浏阳河，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的阿弥岭、林子冲、金盆岭等中方阵地发起进攻。惨烈的长沙保卫战开始。

布置在外围阵地的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与日军展开了

①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蒋介石致薛岳密电》（1941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激烈争夺，“激战五小时，我阿弥岭、金盆岭阵地全被敌空炮摧毁，守军大半牺牲”。当天下午，在工事被敌人炮火摧毁、战士伤亡很重的情况下，预备第10师放弃了第一道防线，后退至半边山、左家塘、农林实验场一线，继续抵抗。^① 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连夜轮番进攻。善长夜战的日军精锐加藤大队（大队长加藤素一）曾一度攻下邬家庄和军储库附近阵地，威胁到长沙市区。预备第10师迅速派兵反击，“即与敌肉搏战斗，并纵火烧毁民房，敌无一幸免”。中方又击退敌人，夺回了两处阵地，“是役毙敌加藤少佐及小琢登大尉以下官兵百余员名，并俘获敌作战命令、阵中日记等机密文件甚多”。^② 从加藤身上搜出的文件显示了日军弹药已严重不足，这更激励起中国官兵的斗志。

2日，中日两军仍在长沙东南郊的预备第10师阵地前激烈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得而复失，失而复得，阵地前沿尸横遍地。中国守军装备火力不及敌人，但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用猛烈炮火轰击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战斗呈胶着状态。蒋介石为鼓舞守城将士士气，给第10军军长李玉堂及3个师长周庆祥、朱嶽、方先觉打电报，内称：“我第10军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10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10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

① 《陆军第十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9页。

② 《陆军第十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1页。

获得无上光荣。”^① 次日，蒋介石又命令前线各军师长，应勇猛前进彻底歼灭敌人，如敌军由各部之作战境内安全逃窜者，即严惩该部各级主管及幕僚长。

由于第3师团攻城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击，久攻不克。第11军决定增加兵力，命令在槃梨的第6师团“以主力进入第三师团的右翼，攻克长沙东侧和北侧”。^② 该师团立即向长沙挺进，在3日拂晓从长沙东北侧开始攻击中国第190师阵地。这时，长沙城的东侧成了激烈的战场。第10军官兵英勇抵抗，使敌人死伤惨重却进展甚微。第6师团虽有一部从北郊冲入城区，但在中国重炮轰炸之下无法立足，被守军反攻驱出城外。

日军主力攻城3天，仍未能入城，虽取攻势却已是强弩之末。日军原来并无攻长沙的计划，工兵“没有携带足够破坏城墙的炸药”，攻城更加困难。其他部队所带弹药也有限，连续苦战，消耗极大，在进行长沙外围的战斗时，弹药已经极端缺乏，有的士兵只有靠拼刺刀和肉搏来作战。^③ 虽有飞机空投些物资，但对于激烈战斗所需的补充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第9战区为加强长沙城内的力量，在3日命令第77师渡过湘江进入长沙，归李玉堂指挥，成为第10军的总预备队。此时，处在外围的中国各军也由远处向长沙逼来，基本上到达了战区规定的第一次攻击线。

在长沙久攻不下，又有被围可能的不利情况下，日军开始考虑撤退问题。当时，第3师团伤亡已达7百多人，所携带弹药几乎消

① 《蒋介石致薛岳等密电》(1941年1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长沙会战》，第171页。

③ 《长沙会战》，第171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耗殆尽,其司令部和后方部队也“不间断地遭受来自岳麓山的重炮轰击,对官兵的精神威胁极大”。^①阿南惟几在参谋人员反复陈说日军的种种不利因素后,决定放弃攻占长沙的计划,于1月3日晚下达“反转”命令,限各部队“自今停止扫荡长沙,于一月四日夜开始反转。”^②在长沙前线的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曾以第一线部队已冲入城内,正在巷战,离占领长沙只差最后一步为理由,“希望把反转日期再延期一日”,遭上级拒绝。^③丰岛对死伤惨重而无战果极不甘心,尤其是想夺回已失去联络的加藤素一大队长。因此,第3师团在4日晨向长沙发起了最后的攻击。经过数日血战的双方军队都以残疲之师做最后一搏,战况空前惨烈。中国守城部队在官兵伤亡极重的情况下,以传令兵、杂务兵、担架兵、输送兵组成一个连,在阵地上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殊死搏斗,“肉搏至再至三,阵地失而复得者五次”。^④第10军不仅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还对敌人阵地进行逆袭,颇有斩获。第3师团、第6师团的最后努力,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使其损失更加惨重,便在4日晚乘夜色迅速脱离战场,分别向东山和梨梨撤退。

此时,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开进中,准备对敌实行围歼。薛岳获知日军已开始后撤,立即变更作战部署,命令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敌军展开围追堵截,要在汨水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全歼日军。其具体部署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第73、第4、第26路军为南方追击军,由南向北追击;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第20、第58军为北方堵击军,堵击后撤敌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

① 《长沙会战》,第173页。

② 《长沙会战》,第183页。

③ 《长沙会战》,第173页。

④ 《陆军第十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3页。

陵基指挥第 37、第 78 军为东方截击军，由东而西截击；第 99 军军长傅仲芳率本军为西方截击军，自西向东截击。“尔后随追击战况之推进，始终按追击、堵击、截击反包围歼灭战之要领围歼溃逃之敌军”。^①

由于日军在长沙周围胶着时间过长，使中方有了从容布阵的机会。和前两次较顺利地脱离战场不同的是，日军这次的退却从一开始就十分的艰难。第 3 师团刚离开长沙，即在金盆岭、林子冲一带遭到中国第 4 军的截击，苦战一天，始得突围，并被迫改变退却路线，与第 6 师团合流。第 40 师团主力由金井退往春华山，因遭到猛烈阻击而一度被迫折回，其留守金井掩护主力的一部（龟川部队）为中国第 37 军所围攻，待增援部队救出时，伤亡已近 400 人，战斗人员仅余 20，几乎是全军覆灭。^② 8 日，第 6 师团向福临铺方向退却，途中被第 73 军等 4 个军反复围打，损失惨重，后经第 3 师团和空军的全力援救，才得以突围。

日军在中国军队的不断阻击和追击之下，几乎一直是在且战且退，处境相当艰难，后撤速度缓慢。经过 10 天苦战，各师团主力才陆续渡过汨罗江。过江之时，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追击，日军争先恐后，乱作一团，“多自相践踏，因此落水溺毙者甚众”。^③ 14 日，日军在汨罗江北集结完毕，一齐向北撤退。中国军队仍继续以各种方式攻击敌军，但因日军主力已经相对集中，漏洞较少，到 1 月 16 日，日军基本上回到新墙河以北的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①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长沙作战》，第 197 页。

③ 《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 383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此次会战,中日双方伤亡均重,日方的损失更大。中国军队的战报说:日军仅在战场上就遗尸 56 900 多具,其中有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 10 人;被俘者 139 人。被俘人数之多,为历次会战所罕见。^① 第 11 军发动会战的目的是策应香港作战,结果不仅作战时间上较香港作战为长,伤亡兵员更高达香港的 2.5 倍,^② 对军心士气的打击尤大。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首次大规模的作战。此时,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上的进攻比较顺利,美英军队接连失利,长沙会战的胜利在盟军方面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提高中国战场的地位和盟军士气,支援英美部队在南方战场上作战,有一定作用。

第四节 正面战场湘、鄂、浙、赣方面的作战

一、浙赣战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鼓舞本国士气,决心对日本进行一次空袭。在罗斯福总统支持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行动计划,组成了一支经过改装的 B—25 型双引擎陆军远程轰炸机队,其指挥官为几次打破飞行速度记录的美国优秀飞行员詹姆斯·杜立特中校,轰炸机由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运到了日本东部海域。1942 年 4 月 18 日,杜立特率领美国 16 架

^①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长沙作战》,第 214 页。

B—25型轰炸机从“大黄蜂号”上起飞，逐次攻击了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名古屋、四日市、和歌山、神户等地。美机在完成轰炸日本本土任务后，没有返回航空母舰，其中有5架安全降落在中国第3战区辖内的浙江机场。

美机此次轰炸东京等地，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空袭，民心惶恐，社会骚动。日本大本营认为：美、英、中空军将以中途岛、海哀尔、澳洲等方面为基地，或从航空母舰起飞空袭日本本土，然后飞到中国寻找降落地点，或从中国大陆起飞，空袭其本土，“此种情况将会愈益增多，此次在浙江省的机场群对于敌军将有极大利用价值。为了粉碎敌上述企图，迅速摧毁浙江省的机场群，特别是丽水、衢县、玉山等地的机场，最为有效”。^① 鉴于此，日本大本营遂于1942年4月30日下达如下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应尽快开战，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根据地，遏止敌利用该方面空袭帝国本土之企图。”^②

日本中国派遣军接到上述命令后，制定了如下作战方针：以第13军主力于5月15日自杭州方面开始攻击中国第3战区东部，摧毁浙江航空基地。以第11军一部攻击第3战区西部，策应第13军。同时命第1飞行团迅速攻击中国各航空基地。

日本大本营的作战设想是，给第13军配属第1军及华北方面军一部，向西进军，摧毁浙江航空基地，作战目的比较简单。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则我行我素，乘机扩大作战规模，调集第13军计5个师团与3个混成旅团、第11军2个师团与4个支队，6月下旬又从华北方面军增派3个大队，共约7个师团82个大队，15万余人，即大约两倍于大本营方案的兵力，由13军司令官泽田茂指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210页，第214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210页，第214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挥,进行歼灭中国第3战区军队,夺取浙江航空基地,打通浙赣路的大规模的浙赣战役。^①无论是作战目的,还是投入兵力,都越过了大本营预定的范围。

此役自1942年5月15日始,至8月30日止。是日军从1939年至1943年5年间,使用兵力最多,作战时间最长的战役。

日军自4月底开始在余杭以东至奉化各个地区集结,第一线兵团于5月13日大致部署完毕,第13军浙赣作战战斗指挥所也于5月11日进驻杭州。

中国第3战区侦察到敌人调动迹象后,进行了紧急部署: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驻淳安,指挥钱塘江北岸部队;王敬久第10集团军驻金华,指挥钱塘江南岸及金华守军;李觉第25集团军驻缙云,指挥浙南部队。重庆军事委员会还从第9战区抽调第49、第26、第74军配置衢州附近,以保卫浙赣两省间的机场。第3战区预定“在浙赣路西段持久抵抗,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已设阵地,逐次抵抗,迟滞、牵制日军,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②

5月15日,日军第一线兵力5个师团及2个混成旅团,从余杭至奉化一线地区,向金华方面发起大规模攻势,中国军队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敌后转移兵力。18日,第3战区第28、第88等各军,在桐庐、诸暨、新昌一线阻击日军后,主力向金华、兰溪之线转移。日军跟踪追击,21日占领义乌、东阳。23日占领武义、建德,并以一部直逼金华、兰溪。在此地区的中国守军凭坚固阵地,以山炮、迫击炮等进行顽强抵抗,形成敌我对峙态势。狡诈的日军以一部继续攻击该地区,另以一部沿金华、兰溪公路向兰溪背后突进侧击,26日陷汤溪,27日陷龙游。此时,金华、兰溪守军已陷于孤立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214~215页。

② 《第三战区浙赣会战作战指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无援境地,经数日激战后,为保存实力,遂于28日放弃阵地。金、兰保卫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第15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在兰溪北部1.5公里处,被守军设置的地雷炸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当场毙命,其兵器部长、兽医部长等官兵被炸死伤者甚多。日本战史著作里写到:“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①

敌占金、兰后,又兵分两路,迅速进至衢江北岸和衢州以东铁路两侧,发动了对衢州的攻势。第3战区按预定计划部署如下:第86军固守衢州;第30军驻寿昌以西的大同镇;第26军驻衢州以西的江山、常山之间;第40师在铁路正面;第49军驻衢州以西的招贤镇,准备在外围给进攻衢州日军以包围攻击。

此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败北不久的日本第11军为策应第13军进攻衢州,调集第34、第3师团及今井、井平两个支队和部分伪军,约4万兵力,由军长阿南惟几指挥,于5月31日自南昌渡抚河东犯,6月3日进至同源、李家渡、进贤一线,与自金、兰出动之日军,形成东西夹击中国军队的态势。

第3战区认为,衢州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乃于6月3日下令至各部队,准备6月4日与敌决战。就在第3战区下令的当日,蒋介石认为,日军已从缅甸北部攻进云南,形势比浙江前线更为严峻,令第3战区避免在衢州附近与日军作战。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令后,命第86军一部守卫衢州,其他主力部队向浙赣路两侧阵地转移。

6月3日拂晓,日军第15、第22、第32师团向衢州发起总攻,黄昏以前突破纵深10公里内线的阵地带。衢州东部中国守军阵地全被摧毁。4日,大雨如注,乌溪江等各河水上涨,日军无船,铁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329~330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路桥又被中国军队在3日午夜炸毁,被滞留乌溪江东岸。5日,日军趁天气好转,全力以赴攻击衢州南部守军阵地,并力图渡过乌溪江,但因缺乏器材,渡河毫无进展。同日,守城的第86军16师奉命留一团继续守衢州,其他部队共2000人,由城东南方向突围。突围部队遭日军袭击,伤亡甚重,当到达南溪口街与26军会合时,只剩千余人。6日,暴雨倾盆。清晨,日军河野旅团将铁路桥临时修通,渡河向衢州城北侧进逼,第15师团自衢州城南铁路沿线及西南地区,压迫衢州城外中国守军。中国守军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日军于当日8时15分攻占了衢州机场,随后又占领了营盘山附近的航空学校。入夜,日军继续猛攻,相继占领了衢州城的大南门、中南门、东北门、北门及城墙西北角。中国守军拚死抵抗,日军未能突入城内。^①

7日晨,中国守军因弹药打尽,无法再战,乃从衢州城东突围。日军占领衢州,并立即将机场破坏殆尽,实现了其发动浙赣战役的部分战略目的。

日本第13军在攻陷衢州后,调整了部署,以第16师团及河野旅团警备该地区;以第15、第22、第32师团等部队继续西犯,向玉山、常山、广丰、上饶方向进击。

6月9日,日军攻陷常山。12日下午,攻陷玉山。中国守军暂编第13师一部与日军在广邦附近五峰山奋战6昼夜,歼灭日军1个联队。中国军队某营仅剩官兵7人,仍坚守阵地。14日22时,日军第22师团占领中国第3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②

在赣东方面,日本第11军为配合第13军打通浙赣路,在东犯并于6月2日攻陷进贤后,遭到中国军队有力阻击。中国第100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337-341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342页。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正面战场

军第 57 师一部在将军庙、东乡等地与敌逐次战斗，并在邓家埠给敌较大打击后，主力即向鹰潭、贵溪以西撤退。企图在此地区阻止第 11 军东犯。6 月 11 日，第 11 军令其第 34 师团进击鹰潭，并令第 29 独立飞行队相配合。13 日，师团进入鹰潭、贵溪之间地区，遭到该地区守军第 100 军的顽强抗击，激战至 16 日，鹰潭、贵溪失守。在此期间，浙赣铁路之南日军第 11 军一部于 6 月 12 日前，先后占领崇仁、宜黄、南城等地。自 6 月 12 日起，中国军队进行了局部反攻，至 16 日，第 79、第 4 军等部先后收复南城、宜黄、崇仁等地。此后，日军曾再次攻陷崇仁、宜黄。

7 月 1 日 10 时 30 分，沿浙赣路东西对进的日军第 13、第 11 军各一部在横峰城会师，实现了其打通浙赣线的战略目的。遂把作战重点进一步转向竭力破坏中国军事设施，尤其是机场、铁路，并大肆掠夺中国的军需资源。

在浙东南地区，中国撤退至敌人后方的军队，乘日军西犯之际，对其进行了频繁的袭击，以牵制西犯之敌，相继克复寿昌、永康、浦江。6 月 18 日，一度克复武义。敌人匆忙抽调兵力再犯浦江。中国新编第 21 师奋力抗击，第 63 团几乎全部阵亡，全师仅存 2000 余人。日军还于 24 日攻占丽水，破坏了丽水机场。7 月 9 日沿瓯江进占青田，11 日再占温州，打通了瓯江水陆运输线。

自 7 月初起，浙赣线两侧中国军队利用日军转防之际，发动了局部反攻，收复了一些地区。7 月 7 日，第 192 师克复新登；15 日，该师又收复桐庐。19 日，第 62 师克复建德。第 75、第 108、第 147 等师，也于 18 日、19 日先后收复横峰、弋阳等地。

7 月 28 日，日本大本营鉴于发动浙赣战役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令中国派遣军停止浙赣作战，向原驻防地返转。因金华附近地区盛产日本炼铁、制铝工业急需的萤石，日军为保障源源不断地掠夺此资源，将第 22 师团等部留置于金华、武义、东阳地区，以达长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期占领之目的。其它各部队,自8月中旬起开始撤退,至8月30日基本返回原驻地。

中国军队乘敌收缩兵力,收复了失地。至8月30日,除日军继续占领的金华附近地区外,第3战区大致恢复了战前态势,浙赣战役结束。浙赣战役历时3个半月,日军侵占浙、赣两省48县,达10余万平方公里,给中国军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国军民死亡25万人,其中军队官兵阵亡4万余人。日军亦遭受严重损失,死伤官兵共28955余人,军马2600余匹。

战役前期,中国军队在金华、兰溪、衢州地区,顽强抗击日军进攻,使其受到相当阻滞,尔后又主动放弃原定在衢州与敌决战的部署,把大部队转移到外线山地作战,这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机动打击敌人。战役后期,中国军队也能主动出击,收复了失地。

但是,中国军队也存在严重缺点,当日军随着战场扩大,逐渐丧失战役初期集中兵力、强攻突进能力,陷入分散被动态势时,中国军队某些高级将领消极避战,保存实力思想严重,缺乏积极出击敌人侧背的决心和部署,贻误了不少战机。尤其是中国军队虽已觉察到日本撤退的意图,但无乘机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气魄,没有实施像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那样的追击包围战,给敌人以更大打击。

二、鄂西会战

1943年4月,日军第11军为打击鄂西中国第6战区主力,进一步控制长江上游交通,威胁四川,夺占洞庭湖主要产粮区,发动了鄂西战役(日本战史著作称为“江南歼灭作战”)。此役自1943年5月5日始,至6月10日止。

4月16日至5月4日,日军第11军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等6个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旅团,共约10万人,分别

在宜昌、枝江、弥陀寺、藕池口、华容一带地区集结完毕,第11军战斗指挥所进驻沙市,准备向鄂西发动进攻。为抵御日军进攻,第6战区在宜昌以西的石碑至石首以南的南县,沿长江一线及其纵深地区,部署了4个集团军共14个军。计划先依托已设阵地,逐次阻击日军,待日军进至石碑以南渔洋关一线时,反攻包围日军,将其歼灭。

5月5日黎明,第11军各部在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下,沿藕池口、华容一线向洞庭湖北岸进攻。6日晚,日军独立第17旅团在攻击黄成嘴时,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独立步兵第90大队长舛尾中佐被守军打死,日军于7日拂晓占领该地。7日至8日,日军小柴支队在进攻南县途中,遭到中国军队在梅田湖至荷花市之间的猛烈阻击,日军步兵第234联队第3大队(坂田大队)的中队长全部被打死或打伤。9日16时,日军占领南县。

5月12日夜,日军第13师团左右两路先遣队在枝江、洋溪间偷渡长江,13日拂晓大致完毕。守军第87军后路受到威胁,遂放弃公安西撤。14日,日军第13师团占公安,22日,占渔阳关。23日黄昏,日军第39师团由宜昌渡江,24日黎明,由卷桥河南岸地区向西南方向发起攻击,守军第18师、暂编第34师据12处山地据点抵抗。5月29日,日军第11军各部已分别进入石碑渔阳关之线。^①

第6战区鉴于日军已进入预定的反击包围地区,当即令第79军由石门向渔洋关方向进逼,第74军由桃源向石门集结,计划6月1日反击日军。5月30日,第6战区各部完成了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将其包围的任务,遂决定提前于当日进行全面反攻,空军亦以大编队机群协助作战。经激烈围歼,31日,日军全线动摇,开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748~761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始后撤。中国第 74 军及第 29 集团军先后克水暖街、三家厂、新安,并进逼至公安附近。6 月 5 日,日军第 13 师团一部在磨市被中国军队包围,大部被歼。日军第 40 师团残部向藕池口、石首逃去,第 3、第 34、第 39 各师团残部分别由宜昌、红花套间逃走;独立第 17 旅团从牛浪湖方向撤退。6 月 7 日,宜都被围日军,在江北日军的策应和救援下,突围东撤。8 日,我反击部队收复宜都,克复枝江。6 月 10 日,日军第 11 军战斗指挥所自沙市返回汉口,鄂西会战至此结束。双方遂恢复战前态势。

鄂西会战历时月余,第 6 战区先是依托要塞工事和长江天险与敌激战,尔后又反击和尾追日军,收复了失地,毙伤日军万余人(一说 4 600 余人^①),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中国军队英勇作战,阵亡 25 400 余人。^② 在此役中,中、美空军参战飞机达 165 架,飞机性能亦较日机优良,预示着中国在抗日作战中,夺取和掌握制空权已为期不远。

三、常德会战

1943 年秋,太平洋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军由攻势被迫转为守势。在中国战区,盟军正计划反攻缅甸。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争和印度、缅甸作战,于 8 月 28 日制订了《1943 年度秋季以后的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要求刚刚发动过鄂西战役不久的第 11 军对湖南常德发起攻击,“覆灭第六战区根据地”。^③ 日军认为,“常德是西部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是重庆军补给命脉的一环,也是战略要冲。如占领此地,东南可窥伺长沙、衡阳,西

① 见何理《抗日战争史》,第 289 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 744 页所列数字累计。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 41 页,第 47 页。

可窥伺四川东部,威胁重庆”。^① 日军遂发动了所谓的“常德歼灭战”。

此役自 1943 年 11 月 2 日起,至 1944 年 1 月初止。

1943 年 10 月中下旬,日军在华容、石首、藕池、峒口、湖堤、弥陀寺、澧市、江陵、沙市等地,集中了第 11 军的第 3、第 13、第 39、第 68 师团,第 13 军的 116 师团,及古贺支队、佐佐木支队、宫胁支队、柄田支队、飞行第 44 战队,合计兵力 10 万以上。同时在监利、沙市间江面,集泊船舰 30 余艘,滨湖各河汉集泊汽艇 300 余艘,民船千艘以上,坦克、汽车也均大量增加。至 10 月底,日军已完成战备,有弯弓待发之势。^②

日军的频繁调动,已为中国军队所侦知。10 月 28 日,重庆军事委员会据来自各地情报分析,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江、洞庭湖三角地带,并可能进攻常德。遂电令第 6 战区作如下应战部署:第 10、第 29 集团军以各军之一部于河沼地带阻敌,各军主力利用津澧河流及暖水街一带山地,侧击敌人,第 74 军 57 师固守常德,该军主力置大附山附近,准备机动;第 100 军推进至益阳待命;中、美空军立即向沙市、监利、石首、华容之敌及沙市、岳阳之间的敌舰轰炸。^③ 第 6 战区接此命令进行具体部署:第 29 集团军第 44 军守备滥泥沟子、南县、甘家人(不含)之线及津、澧;第 10 集团军第 79 军主力、第 66 军一部守备甘家厂、公安、新江口(不含)、宜都之线;江防军第 30 军守备茶子至平善坝之线及石牌西塞;第 26 集团军第 75 军守备之游洞、毡帽山、阎王口之线;第 33 集团军第 77 军主力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 41 页,第 47 页。

② 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1943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26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军令部报告书》,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第59军一部守备栗溪、转斗湾之线，主力分别控置于石门、暖水街、聂家河、三斗坪、窑湾溪、兴山、报信坡、刘候集、安家集、建始各附近，准备歼灭入侵之敌。^①

11月2日17时，日军兵分12路，向滥泥沟子、百弓咀、章田寺、末积田至新江口之线发动了全面进攻。3日至6日间，第6战区第一线部队先后于南县、官垱、甘家厂、公安、磨盘洲、新江口之线，及大堰、张家厂、街河市、西斋各附近地区，予敌坚决抵抗，毙敌颇多。敌虽备受打击，仍挟其优势，在攻占南县、公安、松滋后，猛进不已。迄6日，第6战区第一线战地被突破，战区复调整部署，形成了外线态势。

6日，第10集团军第一线各师已转移至王家厂、暖水街、刘家场、洋溪之线，敌跟踪西犯，并以其主力13师团全部及第3、第34师团各一部，指向暖水街地区。日军要攻占常德，只有占领暖水街，才可保障右翼侧背之安全。于是，在暖水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暂第6师与敌反复争夺，战况至烈。黄昏，后续之敌分由两翼钻隙迂回。7日晨，南钻之敌被98师、第194师在红土坡、岩壁下附近分别围击；北钻之敌受第199师一部邀击，死伤颇多。暖水街正面之敌，不断猛攻，守军凭工事抗击，血战三昼夜，阵地屹然未动。

7日，蒋介石令“10集团军王敬久部，即刻集中主力，击破向暖水街方向突进之敌”。^②正当第10集团军遵令调动部队，准备歼敌于暖水街地区时，日军先发制人，除留一部和守军对峙外，其主

①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1943年1月至12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蒋介石致孙连仲、王敬久密电》(1943年11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力迂回暖水街以南地区南进。至11日夜,第10集团军与日军呈阵线交错,相互混战状态。

11月12日,日军第3、第13师团借夜色转锋南下,麇集石门以北地区,于13日向石门方面的新安、塘坊、樊家桥、螺丝坝第77师及第15师阵地猛扑,守军猛烈抵御,全线展开激战,伤亡皆巨。14日晨,敌兵力续有增加,藉炮火掩护,由易家渡强渡至澧水南岸,企图南北夹击,合围石门,夺取这一常德北方的战略要地。14日夜,石门正面阵地,在敌强攻下,渐形缩小,终全面被围,又兼背水、态势不利,乃不及南下,主力向西转移,仍留暂第5师固守石门要点。自14日晚至15日黄昏,该师彭士量师长亲率所部在敌进攻的重点地区石门北郊的笔架山、大山尖、孙家大山方面,与日军短兵相接,白刃搏斗,官兵伤亡殆尽,阵地几乎全毁,彭士量亦壮烈殉城,时年38岁。以后在收殓遗体时,发现一纸遗嘱:“兹奉令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歼彼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唯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任务。”^①

15日、16日、17日石门、澧县、津市、慈利先后失守。慈利先陷,常德西北已无险可守。

11月19日,蒋介石致电第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令“第74军、第44军、第100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面与之共存亡”。^② 上述各部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展开了鏖战。

^① 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第1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蒋介石致孙连仲等电》(1943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19日,日军第3师团主力由澧水南渡,直扑澧市、桃源。21日,敌机编队16架在桃源上空投弹扫射,并趁势降落伞兵560余,与地面之敌呼应袭击。该城守军不足一营,被迫西移,桃源失守。敌复向澧市进击,第150师师长许国璋亲率该师一部,在澧市西北抵御,壮烈殉职。敌陷澧市后,向北急进。^① 日军占领桃源、澧市,又获得了常德的西南门户,至此,日军迂回包围常德的计划已具备了实施的条件。

22日,进至常德附近的日军兵分五路,攻击常德外围各重要据点:一路由苏家渡(沧港北)扑德山,一股由井鼻滩扑德山市、新民桥,另三路分别向七里桥、黄土山、淤河猛犯。23日,由澧市向西北进击的日军第3师团主力已进至常德南站。至此,日军已完成了对常德的合围,总数已逾两万以上,为敌第3师团一部,第116、第68师团主力。从而,常德保卫战从外围的攻防转入了城内外的鏖战。

24日,敌向常德城区猛扑。常德内外,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奉命固守常德的第74军第57师在师长余程万率领下,与敌反复搏斗。中午,城南中国军队的岩凸阵地经过敌我五易其手后陷落,守军退至陡码头再战。在城东北方的七里桥、城西的落路口,战况亦异常惨烈。激战至夜间,城南告急。在蔡码头及南站的日军,白天曾由南站强渡沅江攻城,被击退。夜幕降临,日军乘夜色再次强渡,中国守军一排士兵决死抵抗,全部战死。日军强渡过沅江后,一部由城东南角水星楼间攀登城垣,突入城内沅清街附近。为了驱退敌人,第57师立即调整兵力驰救,分路合击水星楼日军,经激烈拼杀,将敌逐出城外。日军溃逃途中,守军又予以伏击,歼敌数

^①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1943年11月1日至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百人。

25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以20余架飞机助战,向城内狂轰滥炸并投放燃烧弹,顿时火光冲天,烟焰蔽日。在轰炸后,日军从东、西、北门附近地区全面进攻。七里桥处,双方反复拉锯作战;西门外,双方在船码头激战。此时,守军炮弹已经耗尽,火力锐减,日军逐步逼近城垣。

在常德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多次袭击日军,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25日对日军空袭中,即击毙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长中畑以下官兵多名。

26日晨,敌全线再攻。北门贾家巷一连守军全部战死,西门一排守军壮烈阵亡,日军乘势逼近西大门。敌惨无人道,仅此日就对“常德守军施毒13次”。在此次常德会战中,敌“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①至此日,第57师参战的8315名官兵,仅剩500余名,弹药消耗亦将尽,形势异常严峻。

27日,敌机狂炸愈紧,日军再次全线出击。东门外日军3次冲入城内,均又被守军逐出城外,北门外日军5次扑进城垣,亦均被守军击退。敌虽受重创,仍倾全力猛冲,并不断使用毒气。

28日,日军再次全线猛攻。东门外日军在炮火掩护下采取步步为营战术,推进城内,守军剩余兵员,与敌白刃格斗,拼死肉搏,将日军逐出东门。日军乃改变战术,调集炮火毁灭性地猛摧一点,步兵逐次跟进,再次攻入东门,以民房废墟掩护,四处出击。东门失守后,第57师代参谋长皮宣猷即赶赴城东,将城东南角划成新的防线,指挥残部封锁该线,并令守军利用断壁残垣分点固守,阻敌扩展。在北门,日军施放毒气后,以5路向城内猛攻,守军一营

^① 《常德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概况》(1943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与敌肉搏七八次,所剩兵员不足一班,守军退至天主堂、体育场等巷战工事。在大、小西门,日军亦冲锋多次,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守军第57师各级指挥官伤亡达95%,后勤兵员均到一线作战,且大部牺牲。日军曾向城内空投劝降书,爱国将士断然拒绝。

29日,敌机竟投掷烧夷弹,城区大火蔽天,房屋碉堡皆成灰烬。在日军攻击和熊熊烈焰吞噬下,东门工事全毁,守军全体为国捐躯。在南门方面,日军将水星楼摧毁,楼内守军全部牺牲。在北门,日军仍向天主堂、体育场的守军攻击。至此,守军已被压迫在城中心狭小范围内,第57师剩余官兵下定了必死决心,师长余程万电告第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副、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①

30日,日机轰炸第57师设在中央银行师部。日军从东、北、西门分别向大小高山巷、局北街、中山南路、体育场推进。守军官兵人自为战,全部战死在其散兵作战位置上。

12月1日,日机继续轰炸中央银行师部,东、南、北门的阵地已全部失守,只剩下兴街口经中山南路和大西门一隅城区。敌穿墙凿壁,节节紧逼,师长余程万及各级幕僚亲任指挥,尺土之微,誓死必争。

此时,由衡阳增援的中国第10军预备第10师,进至常德附近与日军第3、第13师团一部遭遇,已激战了4昼夜。第6战区各路反击部队,由沅江、澧水两岸向常德逼近,对日军实施外线包围,并曾先后克复慈利、桃源等多处失地。第10军30日占领了德山,

^①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1943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正面战场

先头部队进抵常德南站,因无法渡过沅江,难入城与第57师会合,守军仍以所剩无几的将士与日军死战。

2日,日军攻陷常德城中的兴街口,中国守军阵地仅剩方圆数百米的区域,且粮弹告罄,实难继续坚守。3日凌晨,余程万率余部冲出重围,渡沅江与南岸友军会合,加入反攻作战行列。城内仍留少量部队由第169团团长柴意新率领,与敌作决死之战,柴意新率少量官兵与敌肉搏10余次,全部壮烈战死,常德城陷落。

常德陷落后,第6战区外线部队继续反攻作战,接连收复失地,并于7日开始反攻常德,扫除常德四郊敌军。9日,中国军队渡过沅江,从东、西两面夹击常德,并从西门攻进常德城内,日军仓惶突围北逃,常德克复。

10日开始,日军全线退却,中国军队尾追不舍,乘机歼敌,克复了此役日军占领的失地。至1944年1月初,会战双方恢复了战前态势。

在此次会战中,中国守军在恩施、芷江、衡山、白市驿(重庆西)、梁山等基地,出动战斗轰炸机合计200架,出击261次,使用轰炸机280架次,战斗机1467架次,^①对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日军实施攻击,有力地支援了陆军作战,并在空战中击落日军飞机25架,在地面击毁日军飞机12架。^②

为策应常德会战,驻守在长江以北的中国预备第4师、第6师、第37师、第38师、第141师、第179师等部队,从11月8日起,向进攻常德之敌在江北的据点发动了猛攻,至12月13日止,攻克敌大小据点30余处,毙伤敌2000人以上。其中,第37师一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65页。

② 《常德会战之检讨》(1944年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部曾于11月25日围攻当阳,激战竟日,先后突入西关、祖师庙,包围敌第39师团司令部及敌东关空军指挥所,毙敌大佐一员,参谋副官以下150余人,并焚其仓库数所。^①敌后院战火四起,受到一定牵制,有利于常德附近中国军队的对敌作战。

此次会战,总计毙敌联队长中畑护一、布上照一、和尔基隆等,敌官兵伤亡约4万余人。中国军队亦阵亡第150师师长许国璋、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伤亡官兵约5万余人。^②在会战中,中国军队除少数部队外,均极为努力认真,勇往直前,即使迭经战斗,损失甚重者,亦能斗志旺盛,反复进击。尤其是第57师官兵,在敌飞机狂炸,火炮猛轰,毒气弥布下,与敌血战16昼夜,兵亡官继,弹尽肉搏,宁可战死,决不投降,表现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五节 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

一、中国远征军的组成及其入缅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于1941年12月9日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组成反法西斯各国常设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或联合军事会议,并召开首脑会议。罗斯福、丘吉尔对此立即表示赞同,并希望“尽快行动”。斯大林虽极表赞同,但又表示苏联“目前

①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1943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常德会战之检讨》(1944年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不能对日宣战”，不便直接参与对日作战行动。

1941年12月10日、11日，蒋介石在重庆数次邀集有关各国大使和武官，商讨联合抗日的具体计划，达成了组织中英联军共同保卫缅甸，并由美国向中国和中英联军提供援助等协议。16日、17日、19日，蒋介石为确保缅甸和滇缅路的安全，以便美国的援华物资能经缅甸和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粉碎日本妄图困死中国压迫中国屈服，并进击印度与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的迷梦，又数次同美国的高斯(Clarence E. Gauss)、麦克卢尔(Robert B. McClure)，英国的卡尔(Orchibald C. Kerr)、丹尼斯(L. E. Dennys)和荷兰的保斯等人分别会谈，磋商组织联合军事委员会和召开中、美、英3国联合军事会议的具体步骤。

12月23日，中、美、英3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黄山蒋介石官邸举行，美国代表是勃兰特(George H. Brett)和麦克卢尔两位将军，英国代表是在其殖民地印度担任全军总司令的魏菲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中国参加会议的有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人。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达成如下协议：(1)组织中、美、英、荷联合参谋会议，定期开会；(2)建立中、英联合军统帅部，人选另商；(3)组织中国远征军3个军入缅布防；(4)由美国向中国军队和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志愿队提供急需的武器、弹药、燃料和配件，并着手用美国武器装备中国在云南的军队；(5)使用美国空军协防缅甸和云南。26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建立了军事同盟。中国远征军依此入缅与英军协同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1942年1月1日，中、美、苏、英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宣言》，宣布共同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1月2日，蒋介石就任盟国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泰国)最高统帅。3月8日，史迪威被任命为战区参谋长，中国遂与盟国共同对日作战。

1941年，日军开始向缅甸进攻。12月23日，54架日本轰炸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机第一次空袭仰光,滇缅公路(昆明—仰光)战云密布。中国政府即刻向英国提议,同意早已集结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协防英军。可是,英国对中、英军事合作三心二意,既不肯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藐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又担心中国军队入缅后将使中国在缅甸的影响扩大,助长缅甸人原有的反英情绪,危及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英国虽前已同意中国军队入缅,但很快就出尔反尔,请中国军队暂勿入缅,延误了入缅时机。

中、英在缅甸的军事合作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1942年1月,日本第15军司令官坂田禅二郎指挥该军第33、第55师团从泰国向缅甸发动攻势,第55师团于19日轻取缅甸战略要地土瓦,引日军进占缅甸第二大港毛淡棉(Moulmen);日军另一路第33师团于2月4日攻占毛淡棉北面的巴安,8日强渡萨尔温江,突破了仰光东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3月4日,日军第55师团进占仰光东北100公里外佛都勃固(Pegu)。开战仅仅两月,英军防御即濒临崩溃,缅甸战局危殆。英国为了利用中国军队阻滞日军,掩护在缅英军向印度撤退,才同意中国远征军陆续开进缅甸。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部队番号和指挥官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后由罗卓英继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第5军(军长杜聿明兼),下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游击支队(司令黄翔);第6军(军长甘丽初),下辖第49师(师长彭璧生)、第93师(师长吕国铨)、暂编第55师(师长陈勉吾);第66军(军长张轸),下辖新编第28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29师(师长马维骥)、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第36师(师长李光鹏)。^①

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从1942年2月起,陆续开进缅甸。

^① 参见《远征军印缅抗战》,第449~4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3月7日,日本南方军又将第18、第56师团补充给第15军。至此,由坂田禅二郎指挥的侵缅日军共约有4个师团10万人。3月8日,由于美英未能在仰光组织有效的防御,仓惶撤出,日军第33师团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仰光。日军占领仰光不仅切断了滇缅公路的海上入口,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而且打开了通往缅甸全境的门户,掌握了缅甸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实现了其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随即日军又制订了预定于5月底以前捕捉中英联军主力,嗣即在缅甸境内“肃清残敌”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为实现此计划,日军分兵3路北犯:中路由第18、第55师团沿仰光经同古(Toungoo)向曼德勒(Mandalay)进攻,其为主攻方向;西路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进攻仁安,包抄曼德勒的左翼,东路由第56师团进攻腊戍(Lashio),企图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回国退路。

二、同古、曼德勒方面的作战

正当日军兵分3路北犯时,中国远征军适时赶到前线,针对日军进攻,作了如下抵御部署:以战斗力最强的第5军担任日军主要进攻方向的同古到曼德勒之线的作战;以第6军担任东路莫契(Mawchi)、雷列姆(Lo-lem)方向的作战;第66军控制在曼德勒、腊戍一带为预备队,待机歼敌。西路伊洛瓦底江沿岸的作战,由英缅军第1军团(该军团辖英缅军第1军,英印军第17师,英装甲兵第7旅)担任。

中国远征军戴安澜第200师附骑兵团及工兵团一部,于1942年3月8日到达同古,9日接收英军防务。11日,以骑兵团等部推进至皮尤河(Pyu)及其南12公里处担任警戒。3月18日,英驻缅军全部撤退,日军第55师团跟踪追击,到达皮尤南12公里处,与中国远征军发生了激烈的前哨战,远征军掩护英军脱离了敌人,安全撤退。远征军前哨部队连日完成预定任务后,即在黑夜撤退,埋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伏于皮尤河南岸两侧,准备阻击冒进之敌。19日晨,日军果然追击英军,以轻快部队冒进,当日军军用汽车数辆行至桥北端时,远征军即用早已准备好的电气导火爆炸,全桥轰然陷落,敌车尽覆,后续车辆霎时拥塞南岸公路,但日军仍下车顽强挣扎。这时,远征军骑兵团已完成既定任务,转移至后方既设阵地,皮尤河岸仅留少数部队,阻击迟滞敌人前进。战斗至深夜,也撤到既设阵地。

皮尤河前哨战是中国远征军踏上缅甸后,对日军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事实让英军改变了对中国军队的看法,同时也拉开了同古、曼德勒方面作战的序幕。

3月20日,同古保卫战打响。敌自受远征军伏击后,行动极为谨慎。先头部队以步骑兵联合的五六百人,搜索前进。发现远征军在同古以南的鄂克温(Oktwin)设有前沿阵地,随即以一联队附山炮4门,向鄂克温阵地猛攻。21日,敌增炮2门,用6门大炮整日攻击,敌机还轮番轰炸同古。守军勇猛还击,阵地屹然未动。22日,炮战激烈,敌一部企图迂回攻击,亦被击退。远征军第200师虽是孤军深入,后援困难,但师长戴安澜决心誓死抵御到底。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①23日,敌增至两联队,炮12门,以战车、装甲车掩护向鄂克温阵地攻击,敌机20余架连续6次投弹。守军以步骑配合向敌侧反击,毁敌战车、装甲车各两辆,汽车7辆。夜八九时,敌再次攻击,阵地被突破一部,对战彻夜。24日,日军在正面猛攻鄂克温阵地的同时,另一部五六百人向同古以北8公里的克永冈机场迂回攻击,并攻占了机场,切断了

^①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戴安澜将军》,第4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00师与军部的联系。当晚,戴安澜调整部署,下令放弃鄂克温、坦塔宾前沿阵地,集结全师主力保卫同古。他带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表示了与同古共存亡的决心。

日军进占鄂克温后,即兵临同古城下,尽管第200师官兵浴血奋战,但作战态势已对中国远征军十分不利。自3月17日起,敌机多次对同古狂轰滥炸,市区房屋均被摧毁,戴安澜虽要求派飞机助战,但是负责缅甸盟军空战的英国空军,此时已一片恐慌,根本不愿派机助战。21日,日机突袭英国马格威(Magwe)空军基地,炸毁飞机40多架,美国空军志愿队6架飞机也被同时炸毁。至此,英国在缅空军全部覆灭,日本取得了缅甸的制空权,对中国远征军造成了极大威胁。

25日拂晓,日军第55师团3个联队倾巢出动,由北、西、南3面围攻同古。第200师沉着应战,并火烧森林阻敌前进。26日,敌主力突破城西北角,第200师退守同古铁路以东,继续抵抗。敌我争夺战激烈,双方伤亡较大。27日,敌主力继续围攻同古,因已是双方短兵相接,日军优势炮火失效,第200师官兵沉着固守,敌伤亡较重。28日,日军第56师团赶赴同古参战,中国远征军第6军亦派新编第22师前往解围,双方援军对峙于同古以北的永冈一线。日军集中主力消灭在同古的第200师,对新编第22师暂取守势。日军地面炮火与空军协同攻击同古,并向城内施放糜烂毒气。日军还化装成英缅军及缅甸人士驱牛车暗带炸弹,企图混入同古城内,里应外合,均被第200师查出消灭。当夜11时,一股敌军从同古东南渡过锡唐河,偷袭河东的第200师司令部,戴安澜指挥少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量部队沉着应战,并令城内守军夹击,将敌军逐出,控制了局势。^①

29日拂晓,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虽然攻克了南阴车站,但是,向同古的进展仍较缓慢,同古守军第200师在日军连续攻击下,弹尽粮绝,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为了让第200师摆脱险境,保存实力。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下令该师于当晚突围。突围时,戴安澜率兵断后,并派一部佯攻,掩护主力过锡唐河。30日晨,全师均有秩序地撤至叶达西(Yedshc)附近。

同古保卫战,历时12天,第200师官兵在强敌压境,后援不至的情况下,以高昂的斗志,同4倍于己的日军第55师团激战,予敌以重创,打出了国威。是役击毙的日军大佐横田所遗日记称:“南进以来,未遇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日军对第200师的勇敢也深表钦佩,认为:“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勇敢,军司令部坂田中将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②此役,中国远征军毙伤日军三四千人;^③第200师亦损失严重,伤亡达2500人。^④

3月28日,即同古保卫战最后阶段,蒋介石急电远征军,“如同古完全失陷,拟即在平满纳(Pynman,是同古至曼德勒之线上的军事重镇),附近相机决战”。^⑤3月31日,杜聿明草拟了平满纳会

① 参见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16-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著:《缅甸作战》上册,第6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林蔚致蒋介石》(1942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同古战斗第5军人口伤亡数》(1942年4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蒋介石手令》(1942年3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战计划。其方针是“军以持久、消耗敌人之目的，即以阻击兵团逐次阻击消耗敌人后，以固守兵团吸引于平满纳附近，待其胶着，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平满纳周围而歼灭之”。^①并据此部署兵力：第5军第22师为阻击兵团基干，第96师为固守兵团基干，第200师配属特种兵一部为机动兵团基干。4月5日，蒋介石第三次视察缅甸时，批准了这一方案。此时日军继续以主力沿同古、曼德勒轴线实施进攻，同时仍以东西两翼的进攻为策应。

4月5日拂晓，同古之敌开始以飞机掩护，炮20余门，战车16辆，步骑联合约1师团的兵力向远征军第22师阵地猛烈进攻。嗣后每日不断以炽盛炮火及飞机多架轮番轰炸，向第22师斯瓦(Swa)主阵地右翼迂回，官兵皆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虽伤亡甚重，仍坚守不退，英勇抵抗。至10日止，当面之敌经斯瓦东西之线守军猛烈反击，攻势渐减。此间，远征军共毙敌两千余，守军伤亡营长3员，连长9员，士兵3300余名。^②

4月11日至16日，敌增援部队轮番进攻，新编第22师按照预定计划，逐次抵抗，转移至平满纳南侧山地新阵地。此间，毙伤敌约2500余，新编第22师伤亡营长以下官兵千余人。^③正当远征军第5军实施平满纳作战计划大体就绪，准备进至预定地区转为攻势时，英军负责的西路作战却接连失利，导致全线撤退，使第5军右侧后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

① 昆明参谋团：《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1942年9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杜聿明致徐永昌密电》（1942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1942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三、援助英军的仁安羌之战

西路方面,日军向英缅甸军第1军团防守地区进攻的是第33师团。英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3月23日,正当日军第55师团猛攻第200师阵地不下时,日军第33师团即攻占了英军据守的勃生机场及勃坦;25日,第33师团继续北犯,英军稍事抵抗就放弃了緬拉、济贡、木参地、德贡(Tatkok)。31日,又撤出兰谬。4月6日放弃亚兰谬(Alansmyo)。12日放弃萨斯瓦、东敦枝(Taungdwingyi)和新榜卫(Hsenwi)。14日放弃了重要空军基地和屏障仁安羌(Yenangyan)油田的要地马圭及新甸。15日,英缅甸军第1军军长斯利姆下令炸毁仁安羌油田,霎时,烈焰冲天,英军夺路而逃。日军派出两个联队急速扑向仁安羌,企图保住油田,捕捉英军。同时以一个联队乘车急驰,抢占宾河渡口,把英印军第17师堵在宾河南岸,使之陷入绝境。日军另以一部飞速抢占了仁安羌北面的宾河大桥,截断了英缅第1师和装甲第7旅北逃的通路。英军惊恐万状,虽武装齐全,又有坦克大炮,竟不敢对占据大桥的日军发动进攻,反而掉头后退,涌进附近几个村落和油田建设物中,想等待援军来救。该师师长斯高特(Scott)即率第13旅来救,却被日军击溃。日军第33师团主力随即于午夜赶到仁安羌北郊,将英缅甸军第1师和装甲第7旅共7千多人团团围住。^①

16日,被围英军粮尽弹绝,水源断绝,岌岌可危。师长斯高特一再告急,谓中国军队若再不为之解围,英军便有瓦解的可能。

17日,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奉命驰救英军。该师师长孙立人当即派副师长齐学启率第113团乘汽车星夜直趋宾河

^① 参见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远征印缅抗战》,第1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大桥,同时派该团孙继光团长率突击队先行,袭取北岸桥头堡掩护主力行动;并派人和被围的英军联系,促其固守待援。孙立人则率本师主力乘汽车急驰,由纳玛北侧强渡宾河,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将敌包围,对敌展开迅猛攻击,经反复激烈拼杀,将敌击溃,克复仁安羌,歼敌 300 余人,致使残敌丢盔弃甲,向马圭(Magwe)狼狈逃窜,并及时救出了英军 7 000 余人及被日军俘去的英军和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 500 余人。并将战利品——日军夺取英军的 100 多辆辎重汽车和 1 000 多匹马悉数交还英军。

中国远征军在仁安羌的英勇战绩轰动英伦三岛,扬威世界,受到中外人士敬佩。后来英国政府发给孙立人师长勋章一枚,美国发给孙立人自由勋章一枚。然而英军脱险后,竟不顾解救自己的中国远征军,继续往印度方向逃跑。仁安羌于 4 月 25 日再度失陷,不仅使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的战果付诸东流,而且使准备平满纳会战的远征军右翼受到威胁。

四、东路方面的作战

东路方面,担任防御的是中国远征军第 6 军。当第 5 军在同古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时,为掩护同古左翼侧的安全,第 6 军派出暂编第 55 师一部,向同古以东的莫契、乐可地区推进。同古失陷后,日军第 56 师东犯,4 月 6 日占莫契,并继续向东可方向进犯。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命令暂编第 55 师主力进至乐可。又令第 93 师一部西移棠吉(Taunggyi),布置纵深防御。4 月 9 日,日军向第 55 师克马俾阵地进攻,守军英勇抗击,直至防御阵地被摧毁,始退守保勒一线阵地,与敌反复争夺数日,予敌一定的打击和消耗。此后,日军以战车、汽车组成快速部队,突破了乐可方面阵地,切断了暂编第 55 师后方补给线。日军越过乐可后,继续北犯,棠吉、和榜(Hopong)告急。第 6 军在该地兵力较弱,难以阻挡日军。4 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21日午后,第5军第200师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增援棠吉,因途中延误,至23日抵棠吉两侧时,日军已攻占棠吉。24日拂晓,第200师向棠吉攻击前进,进展迅速。至午,已攻占其西、南、北三面高地。黄昏,继续包围猛攻顽据棠吉市街之敌,至夜间11时,克复棠吉,日军大部被歼,残余一部分向东逃窜,仅有一小部分尚在棠吉东南隘路和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顽抗。^①25日,敌增援部队向第200师反攻,棠吉东面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至晚始将敌人击退。棠吉东南隘路凭险据守之敌也被肃清。

当第200师向棠吉挺进时,第6军一部在和榜及雷列姆附近阵地,阻止日军前进。从4月21日起,日军向和榜阵地攻击,激战2日,守军阵地被摧毁,伤亡甚重,被迫撤至孟旁(Mongpaw)阵地。24日,日军第56师团在占领雷列姆后,乘第6军后方兵力空虚,分两路向西保(Hsipaw)、腊戍进逼;28日陷西保,29日陷腊戍,截断了中国远征军退回国内的陆上交通,远征军遂陷入困境。5月1日,日军占领新维。3日,陷畹町。芒市、龙陵亦相继失守。5日,日军先头部队窜抵惠通桥,被中国远征军第36师击溃。日军另一部于5月3日占领八莫,又于8日占领了密支那,切断了中国远征军从缅北回国的通路^②,后路既断,军心动摇,缅战全局已呈崩溃之势。

五、中国远征军的撤退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后,分两路向云南和印度退却。

① 《杜聿明致徐永昌密电》(1942年4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远征印缅抗战》,第10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5军军长杜聿明鉴于入缅战败,将为印人所不齿,拒绝执行史迪威要他率第5军退入印度的命令,执意率第5军回国。但孙立人新编第38师仍照史迪威、罗卓英的命令向印度撤退。

5月至8月初,第5军各部分为4路,从不同的方向撤退:该军直属部队之一部,新编第22师及长官部所属各单位由曼德勒转进至新平洋(Shingbwigang),因雨季延时2月余,又奉命改道入印。至7月底,到印度雷多(Lado)。第96师及炮工兵各一部经孟拱、孟关、葡萄、高黎贡山返国;第200师及新兵训练处补充第1、第2团自棠吉至罗列姆,以后沿途突破敌人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迂回曲折,费时旷日。至6月1日前后,军直属部队一部及新编第22师到达打洛,第96师到达孟关附近,第200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泸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①

6月至7月,缅甸整日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摆渡和架桥。工兵制造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时连人也被冲走。加以原始森林特别潮湿,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比比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它传染病大为流行。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② 杜聿明途中患病,险些丧生。戴安澜在转战途中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壮烈殉国。是年秋季,在国

① 参见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33~34页。

② 参见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33~34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内为戴安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高度颂扬了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事迹。毛泽东题赠的挽词为：“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的挽词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朱德、彭德怀的联名挽词为：“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原为陆军少将）。是年7月20日，美国总统授予戴安澜军团功勋章，以表彰他在缅甸战役中的卓越战绩和为中国陆军建树的崇高声誉。

远征军第66军、第6军也于同期向云南撤退。第66军历经艰难险阻，直至1942年9月5日，才突破重围，退至滇西碧江。第6军因三面受敌，最后放弃景东，撤回滇南。

中国远征军在撤退途中，由于指挥错乱，环境恶劣，致使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血洒战场的还多。如第5军入缅42000人，撤回20000人，战斗死伤7300人，撤退死伤14700人，^①为作战死亡的一倍多。远征军人缅10万人，撤到滇西和印度的仅4万人左右，足见其损失之惨。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防御战中英勇拼杀，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其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打击。远征军多次救援英军，创造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棠吉恢复战等出色战例，使中、外、敌、友莫不惊叹钦佩。

但是，远征军的喋血奋战并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军早已对东南亚地区各方面情况作了广泛调查，并积累了一定的山区丛林作战经验，准备充分，加之开战不久，即掌握了缅甸制空权，故进展迅速。其次，是中英两国战

^① 参见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34页。

略目标不同。英国本无保卫缅甸决心,拟放弃缅甸,退保印度,中国则要确保仰光出海口,保护滇缅路的畅通。双方战略目的不同,在作战行动上就很难协调一致,相互配合。而且,英军又存私心,很少向中国远征军通报军事行动,一旦战局紧张,即迅速撤退,不顾中国军队安危。再次,令出多门,各行其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其最高指挥是史迪威与罗卓英,具体军事行动则直接受命于蒋介石领导的军委会驻滇参谋团;而英美则把缅甸划入英国负责的南太平洋战区辖制下的东南亚战区,结果令出多门,既没有制订协调一致的作战计划,又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其失败势所难免。

本章小结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的抗战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政府立即对日、德、意宣战,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和反法西斯战场连为一体,随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盟军中国战区的设立,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日显突出。

中外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英国、美国对华援助有相当程度的增加。由于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所赢得的国际声誉,也由于美国的帮助,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提高,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力所限,各盟国间的利益不尽相同,合作过程中仍有一些摩擦。

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民继续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常德会战等作战中给日军以很大的杀伤消耗,保持了原来的战略相持状态,使近百万的精锐日军深陷在中国,有力地支援、配合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对日作战。不仅如此,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中国军队还组成远征军出国作战,在缅甸和盟军并肩作战,创造了同古保卫战、仁安羌救援战等出色战绩,中华儿女血洒异域,扬威海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